

第一章 另一种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  
——论以非物质和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中的作用<sup>①</sup>

埃里克 S. · 赖纳特      阿诺 · 曼 · 达斯特

1. 经济理论的类型和两种教规的基础

据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伪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相互竞争的教规可以长期并存。在其他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了一种新的开端。例如，在一种范式的转变中，科学界从一种人人都认为地球是平面的思想状态转变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变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的。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地球是平面”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在本文中，我们将论证一种对今天的古典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进行替代的教规，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借用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的隐喻，“这种传统就像地下的河流，每隔几十年就会冲出地面”。<sup>1</sup>

我们将论证，在冷战时期，文艺复兴经济学的这种“地下河流”几乎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现在正是再把这种传统引回来的时候。从历史上来看，文艺复兴的教规总是在危机时期被复兴，也就是在把生产（而不是**实物交换**）作为关注焦点的国家危机时刻被复兴。例如，当一种经济排他性地集中在实物交换所导致的金融泡沫破灭时；当一个国家在对当时的领先国家进行认真的追赶时（19 世纪的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及今天的韩国）；或者是当战争迫使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集中在（战时物资）的生产上的时候。今天，对于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来说，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文艺复兴的经济学观念，这种迫切性就愈加急切了。但不幸的，这些地方并不是能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的地方。

---

<sup>①</sup>原载Reinert, Erik S. (Edit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2004, pp. 21-70. ——译者注

这两种不同的教规基本上是以不同的**世界观** (*Weltanschauungen*) 为基础的。这两种教规的思想脉络可以被追溯到“经济学”这个术语首次被使用的时期，被追溯到古希腊。今天的标准经济学是以机械和实物交换为核心的传统作为其基础，而文艺复兴经济学则是动态的和以生产为中心的，它属于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所谓的秩序的国民经济学 (*ordnende Nationalökonomie*) 传统<sup>①</sup>，这种传统所关心的是对经济领域的组织。维尔纳·桑巴特把第二种传统又称为理解的国民经济学 [*verstehende (=understanding) Nationalökonomie*]<sup>2</sup>，纳尔逊和温特 (Nelson and Winter) 称之为**评价经济学** (*appreciative economic*)。<sup>3</sup> 第一种传统根据 (关于呆滞物质的) 物理学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解释，而第二种传统则是以 (关于生命以及人类的才智和意志的) 生物学为基础的。第一种传统是以马尔萨斯的**沉闷科学**<sup>②</sup>为代表，而第二种传统则是以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Christopher Freeman) 的“希望经济学”<sup>4</sup>为代表，这种经济学因为**人类知识永无止境的边疆**从而成为可能。

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坚实地根植于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直到以杰文斯 (Jevons)、门格尔 (Menger) 和马歇尔为开端的新古典传统。在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多次再版的《经济学》内封底上，这种教规性的序列明确地被命名为导致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经济学的家族树”。经济理论中的替代性教规在时间上与萨缪尔森的“家族树”是平行的，我们把这种替代性的教规命名为**文艺复兴经济学**，我们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教规所代表的价值观支配了这个时期的世界观，但在这个时期之前或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支配地位了。明显地，主流经济学的教规是下一个哲学时期即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个性是以把人类想象为一种精神性存在 (*spiritual being*) 的影像为基础的，这种影像把人类看作是有创造力的和有生产性的。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理性和个性的理解更多的则是物质主义的 (*materialistic*)，它把人类看作是机械的和消费性的 (*consuming*)。今天，文艺复兴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中面临着绝迹的危险，因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思想史越来越集中在

---

<sup>①</sup> *ordnende*这个词等于英文的*ordering*，故译为“秩序的”。——译者注

<sup>②</sup> 因为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著作对人类前途持悲观的看法，所以当时的英国作家卡莱尔就给政治经济学起了“沉闷科学”的这个绰号。——译者注

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上。我们认为，在经济学中，不存在一种“经济政策史”的子学科是导致这种替代性教规被湮没无闻的重要原因。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文艺复兴经济学是乐观主义的：**人类知识永无止境的边疆**与马尔萨斯的**沉闷科学**和主流经济学所谓的<sup>①</sup>生产理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后者在今天基本上仍是李嘉图谷物经济的静态观点的形式化而已。经济理论的文艺复兴教规还具有以下主要的特征：经济福利的基本原因是人类的生产创造力和品行；是**非物质的**生产因素。为了使人类的思想物质化，资本是需要的。在这种经济学的传统中，资本实质上本看作是不结果实的。约翰·雷（John Rae）是一位遵循文艺复兴教规的19世纪的美籍经济学家，我们可以使用熊彼特对约翰·雷的经济学的描述，对文艺复兴传统与主流经济学进行对比：“基本的事情是经济过程的概念，它要比所谓资本积累作为资本主义发动机的这种沉闷的观点高明的多”<sup>5</sup>。当古典经济学关注于实物交换、交易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文艺复兴的传统则集中在以人类创造力为基础的生产上。因为这个原因，文艺复兴经济学强调教育、科学、刺激和企业家精神。

主流经济学把法国**重农学派**<sup>6</sup>（即“自然法则”（‘the rule of nature’））看作是其鼻祖，按照这个学派的思想，价值是由大自然所创造的，并由人类所收获。然而，在文艺复兴经济学中，价值是通过人类的才智和意志所产生的（即“思想支配”（‘ideocracy’）——思想的法则）。在物质主义定向的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了世界图象的机械化，但在这个时期，文艺复兴传统的捍卫者反对（这种世界图象机械化的<sup>②</sup>）重农主义。<sup>7</sup>文艺复兴的传统是整体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原子论和物质主义的。然而，在这种传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仍是置身于相互联系这种复杂之网之中的个人。这种相互联系的好处首先被文艺复兴的城市所证明，文艺复兴的城市体现了文艺复兴关于**公共福利**（*il bene comune, das Gemeinwohl*）的精神，这是对社会作为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的协同主义的（synergetic）理解。<sup>8</sup>

城市使人们的交往得到了发展，它产生了使个人得到解放的自由、创造力和多样化，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后来，遵循这种传统的国家建设试图有意识地把这些得自于城市的协同收益扩大到更大的国家规模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不得不有意识地修习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科学并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文艺复兴经济学强调民

---

<sup>①</sup> “所谓的”是译者所加。——译者注

<sup>②</sup> “这种世界图象机械化的”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族国家的关键性作用和“统治者”（即政府）的职责，这不只是（根据法学和经济学的古代传统）为福利创造提供刺激而进行管理，而且“统治者”的职责还包括制定计划，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创造需求。

作为这种国家建设战略的一种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市场不得不**被创造**，但这种市场并不是自发地出现的。因为这个原因，国家要在交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种观念在文艺复兴的传统中占有非常牢固的地位，从苏美尔王国的大坝和灌溉渠道到科尔伯特（Colbert）的运河再到肯尼迪（Kennedy）的州际公路项目。用现代术语来说，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战略就是在国界内创造**完全竞争**，并在出口贸易中创造动态**不完全竞争**。与人们对前亚当·斯密经济学普遍的偏见相反，“……为了组织能使供给和需求自动调节的市场，竞争常常需要由国家人为地加以推进”<sup>9</sup>。一般认为，在能够与最发达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之前，一个国家必须在知识密集的经济活动中创造竞争优势。

这两种教规应该在韦伯的（Weberian）意义上被看作是“理想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种不同的特点清楚地导致了这两种教规的分裂。把这两种教规区分开来的第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财富起源上的不同观念：

●在**主流教规**中，财富起源于**物质资源**：来自于自然，即土地、物质劳动力和资本。这些资产的积累是通过**贸易（或交易，trade）**和战争发生的。这种积累是**静态的**，也就是更多的同样东西（more of the same）。

●在**另一种教规**中，财富起源于**非物质资源**：来自于文化，即人类的创造力和品行。资产的积累是通过**创新**累积地改变人类的**知识和工具（技术）**存量所发生的。这种积累是**动态的**，也就是更多地是某种新的东西和质上不同的东西。

把这两种教规区分开来的第二个主要标志是：

●在**主流教规**中，分析的焦点是**实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人类是交易者和消费者）。

●在**另一种教规**中，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生产率**是把心智和物质结合起来的松果腺（the pineal gland）（人类是创造性的生产者）。

这两种教规的第三个基本不同是：

●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e）提出使政治学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来，**主流教规**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分析的单位是原子论的单位（在经济学中，个人就是这种原子论的单位）。

●自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出版以来，另一种教规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整体主义的、有机的和综合性的（来自于**综合的**）。分析单位包括时空中的个人和他们的制度。

在一种非常基本的层面上，经济学的这两种教规建立在关于人类怎样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上。我们把亚当·斯密看作是以物质和实物交换为基础的教规的代表，并把亚伯拉罕·林肯看作是文艺复兴经济学即非物质的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教规的代表：

亚当·斯密写道：

“分工……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实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这是所有的人普遍都有的倾向，而其他动物则没有，一般动物似乎不懂这种交换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契约。……没有人看到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彼此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交换（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76, Chicago edition, p. 17）”。<sup>①</sup>

亚伯拉罕·林肯写道：

“……水獭会建造巢穴，但它们现在建造的巢穴较之五千年前并没有一点不同或改善……人不是唯一会劳动的动物；但他是唯一会改进自己的技艺的动物。他通过发现和发明来实现这种改进……”。<sup>10</sup>

我们也将试图说明非物质的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教规随时间推移的连续性：（1）在**经济理论**中存在着这种非物质的和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连续性，主要是通过引证，我们可以证明，从 1400 年一直到今天，存在着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和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地理转移。（2）这种经济理论扎根于**哲学和经济政策**之中，它可以通过拜占庭和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s）<sup>11</sup>回溯到柏拉图的哲学和苏美尔王国。换言之，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扩散主义的。然而，我们并不排除特别是国家危机和战争时期对

---

<sup>①</sup>这句的译文引自[英]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 页。——译者注

文艺复兴经济学主要原理的“独立发现”。我们也在经济**追赶**的框架中看到了这两种教规持续被应用的型态（pattern）：

在没有把非物质的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教规作为**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并长期实践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sup>12</sup>能实现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在法国[该国在政策方面的现代开端可能是 1461 年的路易十一；而在理论方面则是蒙克莱贤（Montchrétien），让·博丹(Jean Bodin)以及叙利（Sully）]、英国（在该国，政策方面合理的起点是 1485 年登基的亨利七世）、德国、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丹尼尔·雷蒙德，亨利·克莱，马修·凯里，亨利·凯里和史密斯)和日本（明治维新），都确是如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战略在东亚所发挥的作用。在政策层面上，这两种教规发生了矛盾。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实，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区域基本上从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以生产为基础的教规。在文艺复兴的理论中，不同的经济活动为国家福利提供了不同的潜力，但在以实物交换为核心的理论中（没有考虑所交换的产品实际上被生产的不同条件），所有的经济活动在质上都是“相同的”。如果存在任何区别的话，那就是，在标准的教规中，更“自然的”农业被给予了优先的地位，（1）因为它提供的是自然产品；（2）因为农业中的竞争是更“自然的”、原子化的和“完善的”。

对文艺复兴经济学教规史进行追踪，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经济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家族史。因为这个原因，不属于这个教规序列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们就被遗漏了。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们和盎格鲁-撒克逊类型的经济政策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今天，除了英语和数学，总体上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并给这种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种族中心主义的（ethnocentric）特点。最近，美国出版的一本书提出了“经济理论缺乏视野”（或翻译为想像力，vision）的问题。但这本书本身就是是在缺乏视野的情况下进行的研究，因为在寻求替代性的视野时，它从没有冒险超出盎格鲁-撒克逊正统经济学的范围。第三，尽管文艺复兴经济学教规对经济政策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代表人物经常不被看作是“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在涵盖文艺复兴的传统上，无论是在地理还是语言范围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即使是这样的一本著作也遗漏了诸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这样的人物。作为经济学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不仅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为德国经济学传统奠定了基础。从 19 世

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经济学传统在德国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与那时的美国和日本经济学传统具有一致性。熊彼特写到：“但不提莱布尼茨的大名和他的忠实追随者克里斯琴·沃尔夫的大名是经过考虑的。他们固然很有学问，对当时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也极为感兴趣，但他们却没有对我们所讨论的题目做出贡献。”<sup>①</sup>最近，在与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史家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不认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一位经济学家。明显地，对于他来说，只有捍卫“正确”见解的正统经济学家才能配得上“经济学家”这个称号，“正统”这个术语在字面上的含义就是“正确的信仰”。

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政策只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中才大获全胜的，因此，替代性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今天的经济思想史中几乎完全被遗忘了。在过去的经济史著作中，对 19 世纪经济政策背后的理论给予充分论述的著作是奥特马·斯潘恩的《经济史》（*Die Haupttheori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这本著作在 1911 年初版。到 1936 年，它在德国已经被印行 24 版，印刷总数达到 12 万册<sup>13</sup>。这本著作被翻译成了几国文字，有趣的是，它的英文版是以《经济理论的类型》这个书名出版的；突出了斯潘恩关于多样性的意识：确实，经济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教规，而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学。

## 2、文艺复兴经济学教规的家族世系图

文艺复兴经济学教规的影响可以在前古代被发现。管理国家事务的需要和知识的增长是中东地区苏美尔和埃及早期王国的重要特点，例如，著名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图书馆和汉谟拉比统治时期(2300-1900 BC)的苏美尔科学园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王国也产生了今天仍保留着的关于经济和法律事务的大量文献和文件。就像后来在亚洲和安第斯一样，灌溉看来就是创造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一项技术，这导

---

<sup>①</sup>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17. 中译文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一版，第 188 页。——译者注

致了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的需要。因此，灌溉有助于第一个国家的建立。在随后两千年的中东地区，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仍是标准的脚本，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透露出了在当时所存在的一种开明的和人道的法律体系。

后来，在腓尼基人支配地中海贸易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制造业优于原材料生产的文艺复兴原理就被清楚地认识到了。后来，舍拉（Serra, 1613）运用与其同样的原理解释了，与自然财富天生就丰裕的那不勒斯相比，几乎就没有什么原材料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什么是如此地富裕。

在文艺复兴教规的哲学基础上，清楚地存在着一种连续性。柏拉图（Plato）和其他古希腊哲学家强烈地受到了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柏拉图的《共和国》对于开明的文艺复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蓝图。后来，文艺复兴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受到了柏拉图很大的影响。在从前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已经更广泛地详细讨论了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哲学基础<sup>14</sup>。

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413-426）就是按照柏拉图的精神写成的。就像奥古斯汀后来那样，这种非偶然地对柏拉图的重新发现产生了一些零星的“文艺复兴”，例如在沙勒曼（Charlemagne, 768-814）领导下的加洛林（Carolinian）文艺复兴。在沙勒曼的领导下，文艺复兴经济学对教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偏爱就是最大的证明。例如，沙勒曼在佛斯兰德（Friesland）积极地推动纺织业的发展，建造道路，挖通了把欧洲的两大河流——多瑙河和莱茵河——连接起来的运河。

法国在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83）统治时期经历了一种早期的小型文艺复兴。路易十一建立了一种作为文艺复兴经济学典型的模式：为了对抗贵族，他与中产阶级结成联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中产阶级工业品价值但对土地拥有者上层不利的税收体系。路易十一建立了一种作为文艺复兴经济学典型的模式：有利于城市（工业）价值但不利于封建主义（实质上是农业和贸易）。正是文艺复兴经济学——它创造了集权的民族国家——导致了封建主义的衰落。在西班牙，自治公社起义（the *Revolt of the Comuneros*, 1521）<sup>①</sup>代表着一种城市现代化集团在与陈旧封建秩序的斗争中败北的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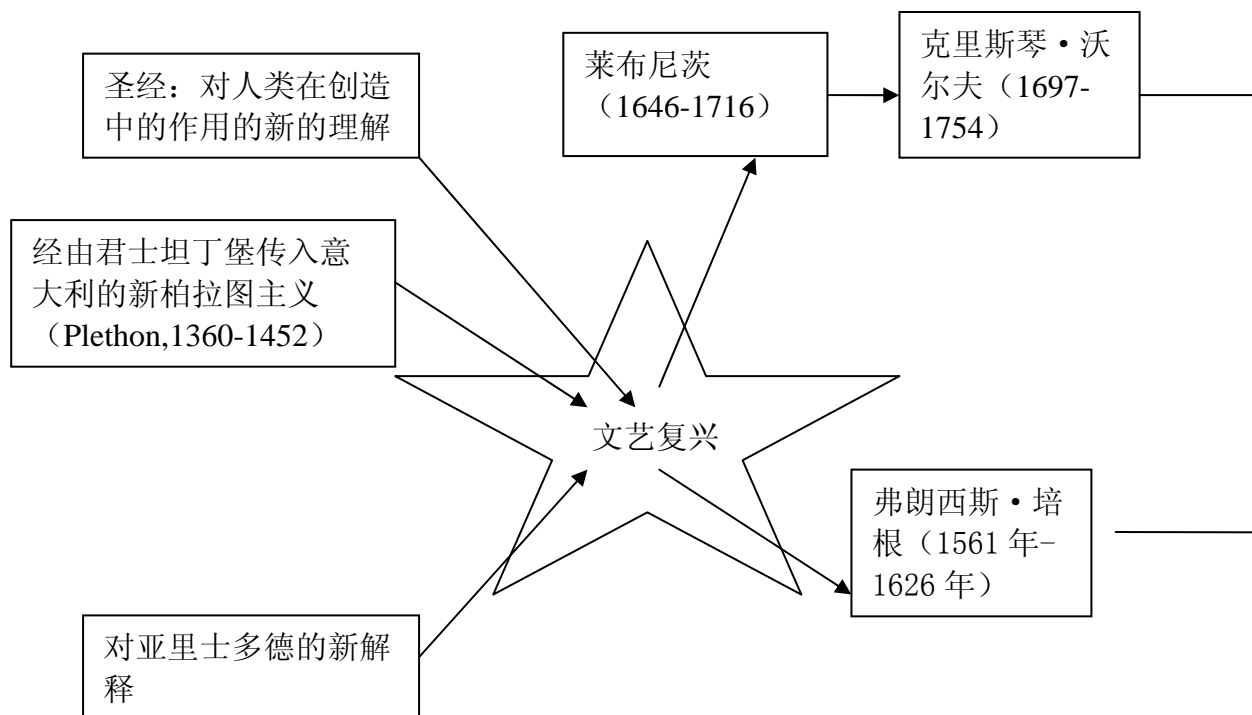
---

<sup>①</sup>指 1520 年在西班牙发生的反对城市限制、反对封建王权和贵族特权的斗争，起义的主力于 1521 年被击败。此后城市自由被取消。——译者注



文艺复兴导致了知识作为人类变化的主要发动机这种思想的再生。重新发现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释，以及来自于正在分崩离析之中的拜占庭帝国（the crumbling Byzantine Empire）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上帝的计划（the Divine Scheme）中人的地位的重新解释。在从前，创新被等同于异端——人类想要知道的所有东西在《圣经》（the Holy Bible）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已存在。所谓的知识生产都被限定在对这些权威性著作的解释上。例如，1271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牛津因为“可疑的创新”而被逮捕。由于受到东正教（the Eastern church）的影响，人们对于他们在创造中作用的感觉完全被颠倒了（reversed）。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上帝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理性创造力。其结果是，创新不再是异端，相反，人类基本的和愉悦的职责就是创新。下一段列示出了文艺复兴的主要构成和有助于文艺复兴的经济学思维在欧洲传播的哲学家名单。

图 1-1 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思想起源



这种新的世界观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都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这种解放产生了列昂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拉斐尔 (Rafaello), 开普勒 (Kepler) 和哥白尼 (Copernicus)。在所有的艺术和科学领域中, 文艺复兴的人物在历史上闪烁着其英雄的光辉, 但是,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却要排除在外, 今天, 他们只能在亚当·斯密歪曲性的讽刺画中偶尔被碰到。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曾任伊莉莎白女王时期的大法官——按照文艺复兴的精神, 大约在 1605 年写出了《论创新》的论文。培根成了“新工业家的科学领导人”<sup>15</sup>, 他敦促运用科学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并从中获利。以制造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在本质上与没有这种基础的社会是不同的, 而且前者优于后者, 这种基本的信念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基本特点。对“制造活动的内在价值”的强调是所有曾经成功地对领先国家实施**追赶**战略的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追赶被完成的时候——这种追赶是从英国开始的, 一个接着一个的——现在的工业化国家才接受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换言之, 没有一个国家在不经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时期就能取得普遍富裕。在英国, 这个时期从 15 世纪末开始持续了四百多年, 而在韩国只花了 40 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

培根对科学知识的强调与两百多年后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常类似：“工业是科学、文学、艺术、启蒙、有用的制度和国家权力之父母……在科学知识上的进步越大，新发明的数目就越多，它节约了劳动和原材料，并产生了新产品和新工艺”。<sup>16</sup>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文艺复兴，经过弗朗西斯·培根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再到今天强调研发和创新在经济福利中作用的演化经济学，存在着思想的连续性。至于自然资源，李斯特说，“工业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一国自然资源的价值”。<sup>①</sup>这种思维是那些已经取得普遍富裕的资源丰富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为了把一国的自然资源转变成国民财富，制造业部门是必须的，虽然它竞争不过英国。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表达了在19世纪对英国进行追赶的国家中所流行的工业观：

“让我们拿波兰与英国来比一比。两个国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属于同一阶段的，现在它们彼此相差得多远！国内自由、智力、技术与科学、国际与国内贸易、航海业与运输的改进、文化和政治力量——对于所有这些，工厂和工业品既是它们的前因，也是它们的后果。要把农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流行学派（即亚当·斯密和J. B.萨伊——作者注）把这种文明的力量归之于国外贸易，这样就把仅仅是属于交换的作用与创造的作用混淆了起来”。<sup>17</sup>

另一方面，脱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必然导致经济灾难和人类福利的大规模降低，下面就是这方面的几个例子：1650年之后的荷兰，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法国，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东欧，post-McNamara 世界银行“调整政策”之后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李斯特最初是一名自由贸易者，但当他看到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脱工业化给国民福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他就认识到了制造业部门的关键性作用。

在李斯特的著作中，我们再次发现了诸如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 1543-1617)和安东尼奥·舍拉 (Antonio Serra)这些文艺复兴经济学家以协同效应为基础的观点。正如我们在引言那章中所指出的<sup>②</sup>，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公共福利

---

<sup>①</sup> List, Friedric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1), London, Longman, 1904, p. 79. 中译文引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一版，第125页，略有修改。——译者注

<sup>②</sup> 作者指的是原书的引言章，见Reinert, Erik S. (Edit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2004. ——译者注

(**common weal**)，也就是促进共同体的繁荣。这实际上是那个时期所有经济著作的出发点。对文艺复兴经济学家们来说，系统效应首先这种观察中产生的：广泛积累的财富是在城市而非农村产生的。这是由焦万尼·博塔罗所撰写的经济学中最早的畅销书之一——*Delle Cause della Grandezza delle Città*<sup>18</sup>的基本观察。这本著作的英文版本1606年在伦敦出版，题为《城市伟大的原因》。1613年，安东尼奥·舍拉对这本书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那个时代最好的这本理论著作中，有关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富裕与贫困的分野被按照以下主要因素被解释：第一，人口的规模和密度；第二，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制造业是“好的”而农业是“坏的”；第三，经济职业**多样化**存在与否，以及发动“良性循环”或正反馈机制的经济活动的不同能力。文艺复兴经济学从三个复杂层次上描述了经济中的系统效应：<sup>①</sup>

1、在**某些经济活动**中所观察到的**更高福利是活动特定的**（仿佛今天就是这样：律师比检葛苳的人要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检葛苳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

2、某些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

3、对于这些系统协同效应怎样发展成正**反馈系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解，但是，顶级的成就是安东尼奥·舍拉1613年的著作，它把威尼斯描述成了一种真正的催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报酬递增和多样化**——后者是指一国当中不同职业的数目——被确定为产生财富的“良性循环”的核心。在舍拉的体系中，那不勒斯是相反效应的例子，因为原材料的生产并不服从报酬递增的规律。（我们在《国富论》中也发现，亚当·斯密自问道，为什么在农业中存在着如此少的分工？另一方面，农业对于他来说是唯一的“自然”活动。然而，斯密没有把它与这种事实联系起来：“非自然”的不完全竞争是精密分工的产物。

---

<sup>①</sup> 这些论点在赖纳特的论文《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被完整地讨论了。‘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Enterprises in Western Countries’, Milan, Bocconi University, October 1996. 中译文请见G. M. 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第十三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注

现在，这些以协同效应为基础的观点可以在诸如保罗·大卫（Paul David）、布赖恩·阿瑟（W. Brian Arthur）<sup>19</sup>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sup>20</sup>等作者论报酬递增的著作中被发现。在我们看来，这些现代作者们在经济学中重新引入了知识、协同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就是文艺复兴经济学在整个历史上的主要特征。在这种脉络之中，李斯特关于制造业作用的观点在下述引文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农业的生产力分散在广大的地区。但是，工业的生产力却聚集在一起并以一个地方为中心。这种过程最终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几何比例而非算术比例得到扩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工业化社会的人口聚集在一些拥有卫星城市的大都市的原因，在这些大都市中，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技能、生产力、应用科学、艺术和文学。在这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的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它们把理论知识应用到了工商业的实践事务之中。只有在这样的大都市中，公共舆论才能发展的足够强大以至于战胜野蛮的力量，保证所有公民的自由，并坚持推动和维护国家的繁荣……

此外，制造业是与生活在许多遥远国度的具有千差万别文化标准的人们进行大量的、有利的和世界范围贸易的焦点。工业把大量价格低廉的、难以长途运输的原材料加工成了具有广泛需求的重量轻和质量高的产品”。<sup>21</sup>

李斯特在许多方面是文艺复兴经济学教规的主要宣传者：他强调了财富的非物质基础（知识和人类的“意志和愿望”），强调了制造业对农业和原材料生产的优越性，强调了基础设施的关键性作用，强调了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这些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理论的典型特征。后来，这些思想传播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则进入了中国大陆。然而，对于**为什么**这些政策是如此地有效率、对经济增长是如此地有益，李斯特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做出分析。无疑，他的观察是准确的，但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他并没有给读者解释他的政策为什么是行得通的。他的理论概念是模糊的，他对经济机制运转的解释是不精确的，或者正如维尔纳·桑巴特在谈到李斯特时所指出的，“他的概念犹如冥界未被超度的幽灵一般”。<sup>22</sup>但是，他对于创造了国家富裕和/或贫困的经济发展基础的整体主义的通见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文艺复兴的理论通常是通过**回溯法**（abduction）发挥作用的，这是某种先于归纳和演绎的直觉类的知识。在柠檬可以抵御坏血病的精确机制（也就是维生素 C）被发现之前的 800 年前，地中海的海员就已经在运用它了。以同样的方式，在文艺复兴的经济学传统中，把“新知识”和“机器的采用”作为导致系统的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

素的代表者，人们成功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德国官房学派经济学传统认识到了，制造业作为征税基础要优于任何其它活动的潜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制造业在德国各邦受到了优待，经济财富的增加和技术变迁就是这种政策的副产品。

### 图 1-2 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另类教规经济学<sup>①</sup>

图在本章末尾，请粘贴过来。注意不要出错。

来源：Jomo K.S. and Erik S. Reinert(eds.)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 Tulika Books, Zed Books, 2005, p. X XI.

我们认为，在这种教规中存在有着强大的连续性。在 16 世纪，我们发现了安东尼奥·舍拉，他在 1613 年的著作<sup>②</sup>为重商主义的观点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按照这种观点，某些经济活动而非其他经济活动是经济增长的载体。舍拉也解释了创造出重商主义者称为**公共福利**的协同效应的机制。舍拉把在制造业而非农业中发现的报酬递增看作是这些机制的核心。舍拉论文的目的是要解释威尼斯的富有和那不勒斯的贫穷，尽管存在着这种事实：威尼斯实际上没有自然资源，而那不勒斯的自然资源则很丰富。舍拉从许多方面对开始于亨利七世（Henry VII）的英国战略为什么是如此成功提供了理论。<sup>23</sup>

在法国，17 世纪的叙利（Sully）和科尔伯特（Colbert）所实施的政策也是以同类推理为基础的。通过阅读科尔伯特的多卷本书信和指令<sup>24</sup>，人们就会为其所扮演的作

---

<sup>①</sup>本图是由中文版中国主编用现在的图替代 2004 年原作而成。——译者注

<sup>②</sup>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les, Lazzaro Scoriggio, 1613. 此书名翻译成中文就是《简论无矿藏国使金银丰富的原因》。——译者注

为一个经营巨大帝国的实业家的角色所震惊：法兰西股份有限公司（France Inc.）<sup>①</sup>从事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的冒险事业，而他则作为这一公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投入者和协调者，他面对的是技术史学家们所说的动态瓶颈的“反向凸角（reverse salients）”<sup>25</sup>—“动态瓶颈”，它使系统的运转受阻并需要经理人员注意。在德语世界中，同一种原理的早期代言人是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他在1684年出版的著作*Ö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共出版了16版，最后一版是1784年出版的。

在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与美国工业政策之间的联系被两位巨人two strong pillars所证实：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惠特利（Whatley）晚期重商主义小册子<sup>26</sup>充满敬佩和热情的评论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有研究说明，汉密尔顿熟悉亚当·斯密的学说，但他坚决拒绝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结论。来自于Malachy Postlethwayt's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的摘录散见于汉密尔顿的*Army Pay Book*<sup>27</sup>中，这些摘录给他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提供了大量的灵感。

当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在他1850年的著作中再次坚实地把报酬递增作为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他再三地引用了安东尼奥·舍拉的著作。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完全理解并赞赏现实经济学的（realökonomisch）重商主义的智慧，虽然桑巴特开玩笑似地承认，捍卫任何一种比亚当·斯密更古老的经济理论是有风险的：“我这样做将会冒被贴上新重商主义者的标签并沦为这一学科的老古董的危险。”<sup>28</sup>

19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特点就是，在试图对英国进行追赶的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大国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和理论的杂交。在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反对自由贸易理论上，他们联合起来了。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追踪了“19世纪最后十年在美国繁荣起来的制度主义（历史）学派的起源。其路线是：它最初是在以马修·凯里（Matthew Carey）和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为首的保护主义学术圈子产生，通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传到德国，在德国，又通过罗雪尔的学术圈子传给了在德国大学学习的诸如帕滕（Patten）和埃利（Ely）等美国学生。”<sup>29</sup> 美国经济学学会所有的创建者都在德国留过学。在明治维新之后，文艺复兴

---

<sup>①</sup> “法兰西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名词不应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具体的公司，而是如“日本股份公司”这一修辞那样，将整个法国形容为一家股份公司。——译者注

经济学的思想传播到日本是由德国经济学家们和曾经在德国学习过的美国经济学家们做出的，在当时，“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德国教师们潮水般地持续流入”。<sup>30</sup>

甚至在本世纪，我们也可以追踪由重商主义给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学所提供的灵感。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背后的主要经济学家是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他是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立即被释放的两个战犯之一。沙赫特在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Der theoretische Gehalt der englischen Merkantilismus*<sup>31</sup>，也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内容”。沙赫特熟练地运用重商主义以生产为基础的战争经济学，与凯恩斯对信贷的理解结合起来，长期以来为希特勒的德国创造了奇迹。尽管如此，沙赫特的工作也证明了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基本要点：经济学不能与道德分离，并且绝不能与道德分离。德国杰出的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冯·普法伊费尔（*J. F. von Pfeiffer, 1715-1787*）——他也是激烈的反重农主义者——以这种说法表达了这种思想：“你可以使人类成为你想要的类型。人们被驾驭的方式导致了人类的向善或邪恶。”<sup>32</sup>

### 3. 两种教规的比较

起源的领域： 国家	国家追赶	衰微的、成熟的和/或不发达的国家
状态	进步的土地权力 大陆的	海洋权力或进步的土地权力 海岛的/地主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社会起源：	民族国家 君主政体的 国家 / 工业 生产性的资本家	封建主义 贵族的 商人/ 地主阶级 榨取自然资源的资本家
倾向：	亲国家 (国家重要)	反国家 (贬低国家)
类型：	国民经济学 工业资本主义	世界主义经济学 金融资本主义



人类的影象:	从事制造的人/从事游戏的人 (HOMO FABER /- LUDENS) ①	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以及国家 的影象)	(潜在地)像上帝一样 理性的 自我能动性的 创造(生产性的) 有同情心的	像动物一样 非理性的/表面上的理性 (按照以下方式行动) 反应性的(本能, 饥饿, 性) 没有创造(消费性的) 没有同情心
人的作用:	生产者	消费者
人的精髓:	宗教性的和高尚的心灵	动物性的和像机械似的
道德义务:	精神性的	动物性的
职责:	模仿上帝	生存

---

①这两个词都是拉丁语，是 18 世纪以来欧洲思想家针对“理性人”和近乎同义的“经济人”概念逐渐发展出的对人性本质的新理解。20 世纪初的荷兰语言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指出：“一个比我们更为愉悦的时代一度不揣冒昧地命名我们这个人种为：Homo Sapiens (理性的人)。在时间的进程中，尤其是十八世纪带着它对理性的尊崇及其天真乐观主义来思考我们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因此现代时尚倾向于把我们这个人称为Homo Faber，即制造的人。尽管Faber (制造) 并不像Sapiens (理性) 那么可疑，但作为人类的一个特别命名，总不是那么确切，看起来许多动物也是制造者。无论如何，另有第三个功能对人类及动物生活都很贴切，并于理性、制造同样重要——即游戏 (playing)。依我看来，紧接着Homo Faber，以及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的Homo Sapiens之后，Homo Ludens，即游戏的人，在我们的用语里会据有一席之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1 页)。“制造人”和“游戏人”的概念突出了人的智慧和技艺，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本性和完整人格，蕴含了人的创造力和自发秩序。——译者注 (参见[http://www.puzhen.net/blog/index.asp?vt=bycat&cat\\_id=29](http://www.puzhen.net/blog/index.asp?vt=bycat&cat_id=29)，)

个人的:	自我和同类居民的完善	追求自我利益 遵循自我的本能和情感
国家的:	“福利国家”	自由放任
公务员的:	使国家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使国家为最低限度的利益服务
福利国家的形象	集体分配	个人分配 (或集体分配: 费边主义)
福利的来源	非物质 创造力/学习 (动态积累) 道德 文化 知识	物质 积累 (静态积累) 贸易、战争和掠夺 自然 土地 劳动力 (数量的) 资本
租金的来源: 余)	竞争  价值创造	资源 (WEALTH): 自然, 资本 (剩  价值波动
推动力:	创新驱动	资源 (WEALTH) 驱动
最具生产力的阶级:	科学家 企业家 艺术家 知识分子	土地所有者 (重农论者) 商人 (Municip. mercantilism) 物质劳动
经济学关注焦点:	生产/ 知识	实物交换 / 农业

(古典学派, 重农学派)

市场焦点:	货币市场 产品市场 管理 (ADMINISTRATION) 赠与交换 再分配	货币市场
市场的出现	被帮助的 (ASSISTED) 标准 法律框架 专利 基础设施 教育	自发的=自组织
价值焦点:	使用价值 道德和物质数量	交换价值 货币数量
强调:	现实经济学 (生产)	金融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焦点:	生产 供给 技术	消费 需求 营销
比较优势的焦点:	能力 动态学习	自然 静态 (给定的: 固守已经掌握了)
总的看法:	乐观主义	悲观主义

	(“知识的无限边疆”)	(“沉闷的科学”)
目标:	快乐	快乐
来源之处:	思想的自由 解放思想和思想的解放	肉体的自由 解放肉体
社会目标:	文明的成长 普遍的道德和福利 文明	物质的增长 个人物质财富
经济政策	选择性的/有区别的	一般化
抽象水平	中等	高
经济活动观	多样性 (产生不平等)	代表性企业 (行为者都是“类似的”， 在理论上产生平等)
经济增长的性质	根本性的不均等 非均衡的过程	要素价格均等化
经济目标	增长的总平衡 (所有部门都处于国家的 协调之中：农业、 工业、服务业和国家)	对于增长一般没有特别指出 (来自国际分工的专业化)
经济手段:	生产率增长 研究 投资	成本削减 (“downsizing”) 贱买贵卖 预算平衡

总战略:	进攻性的 看得见的手	防卫性的 看不见的手
经济政策工具	高生产率 高工资和低失业	低成本 低工资、低通货膨胀和低需求
中央银行:	国家银行 (政治上受管制)	“独立的” 银行 1) 自由银行业 (私人市场) 2) 中央银行业
信贷政策:	有选择性的	笼统的
生产方面的信贷政策:	扩张性的	收缩性的 (害怕通货膨胀)
金融市场的信贷政策:	有管制的	扩张性的 (自由的)
税收政策:	对没有生产率的和低生产率的资本和消费征税	对消费征税, 人头税
补贴政策:	学习, 高技术的未来生产率 (幼稚工业) +社会目的 (传统的 (GRANDFATHER) -/夕阳产业)	不清楚
所有权的地位	看管者 个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看管者	统治者 个人作为绝对支配者
总的经济政策	干预 管制 国家创始	非干预 放松管制 私人投资

寻租:	寻租的管制 为了给（再）分配创造 一般的（工业）租金	防止寻租
国家规制	集中 强政府	分散 最小政府
国际规制	国际间的 双边-/ 多边-横向协定	超国家的 (魁奈, 萨伊, 边沁) 自由贸易的“世界政府”
关税政策:	选择性的 在追赶的同时是管制性的	笼统的 自由贸易
发展援助:	能力的转让 再分配 生产力	贸易、贷款和债务 再分配 货币 (如果有任何的话)
经济政策:	管制 (公共) 通过国家银行 官僚 法律体系, 涉及到信贷、 投资和合约条件	放松管制 (私人) 通过独立的银行业 (私人的或中央的)
投资的发起者:	私人 以下公共产品国家由发起: 软基础设施如:教育、文化”、 研究和新技术 硬基础设施如:思想的交流、 原材料 (包括能源、水)、 制成品、废物的运输	私人

经济学传统:

宗教性的经院哲学	封建主义
民族 (国家) 重商主义	商业 (市政) 重商主义
法国科尔伯特主义	
德国官房主义	
反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
国家体系	世界体系
美国体系	英国体系
美国内战: 北方	美国内战: 南方
德国伦理-历史学派	自由主义
美国制度主义	古典 / 正统学派
	边际主义
	新古典学派
	货币主义

哲学平台:

本体论:	理想主义	物质主义
认识论: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大体上是人类 知识的来源)	心智的 ( mind)	感觉论的
方法论:	(宽广的) 经验主义者	理性主义者
(科学家在经济学 知识上的来源)	非形式化的 定性和定量的 综合	形式化的 定量的 分析 (抽象)

抽象水平（层次）	中等	高
分类: (分类, 普遍性的 和一般性的概念 的地位)	实在论的	唯名论的
理论的地位:	实在论的	工具主义的
哲学传统:	整体主义的/ 新柏拉图主义	原子论的 / 亚里士多德主义
道德传统:	义务论的 (规则)	功利主义的 (目标) (也是目标-功利主义的)
宗教信仰:	一元论的	享乐主义的

#### 4. 两种教规：选择性使用、方法论精神分裂症和机会主义的无知

当然，我们没有意味着世界是二元的：所有经济学家或者属于这种或那种传统。恰恰相反，有几名重要经济学家的关键性特点就在于，他们有时精神分裂似地忠诚于这两种理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两个”马歇尔之间的冲突，一个强调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sup>33</sup>，而另一个则在其《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中却深深地沉浸在“对物理学的羡慕”之中。为了造成均衡——均衡是现代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标准经济理论的特征——马歇尔不得不自相矛盾地求助于**生物学**隐喻。自安东尼奥·舍拉 1613 年的著作<sup>34</sup>出版以来，在整个 19 世纪，报酬递增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论据。为了使报酬递增的存在与均衡相容，马歇尔使用了一个企业像在森林中的树木成长和死亡的罗嗦的隐喻。<sup>35</sup> 这种渐进的增长过程被假定为抵消了由规模报酬递增所导致的不平等积累的趋势。<sup>36</sup> 这种扼杀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更进一步的生物学类比的论证确实是一种生物学类比。这种生物学类比在使经济学成为现代这种模样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物理学中借用来的均衡思想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格式塔。



熊彼特发源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但他终身从事着一种毫无希望的工作：使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创造本质——企业家、新奇和创造性毁灭——通过形式化的方法被纳入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硬核的死一般的均衡框架之中。确实，就像米洛斯基（Mirowski）指出的，熊彼特是“一位活跃的和充满矛盾的人物”。<sup>37</sup>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是同时沉浸在两种势不两立的范式之中的结果。

从这种角度来看，马克思也沉浸在了这两种势不两立的范式之中。就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学的强调而言，就像熊彼特一样，马克思明显地属于以生产为基础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共同通见（visions）基于德国经济学传统。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中，这两位经济学家是以极其具有原创性的面目出现的，但从德国经济学这方面来看，他们都是严格地根植于这种替代性的传统之中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决定性地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的一个方面是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在德国经济学传统中，劳动价值论是没有地位的，相反，企业家、思想、知识、领导能力和管理必然对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附加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亚当·斯密虽然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之后是主流教规的真正奠基者，但他也遭受着同样的教规上的精神分裂之苦。在他对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进行讨论时，他清楚地赞成保护主义的政策，禁止荷兰的船只。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证是基于国防的考虑。对亚当·斯密来说，“在所有的艺术中，战争的艺术确实是最宏伟的（the noblest）”。<sup>38</sup>

最有趣的是要注意到，对亚当·斯密——这位自由贸易之父来说，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航海条例是“英格兰所有商业管制中最聪明的举措”。<sup>39</sup>在19世纪，这种为了迎合英国利益而采取的“双重标准”和对不同教规的选择性利用一直就遭到了德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们的痛斥。他们的口号是，“要按英国人所做的行事，不要按英国人所说的去做。”在今天，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一种恰当的战略就是，“做美国人所做，对美国人要求你所做的别抱有希望。”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运用双重标准的部分原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史采用了一种“机会主义无知”<sup>40</sup>的态度。

在遇到法国重农学派之前，早年的亚当·斯密清楚地表达了文艺复兴关于公共福利（a the **Common Weal**）——社会协同效应——作为建立制造业之动机的观点。建立制造业既不是为了支持生产者，也不是为了援助消费者：

“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同样的热爱以及对条理……之美的同样的重视，常常使那些趋于增进公共福利的制度为人们所欢迎。……当立法机关设立奖金和其他鼓励措施以促进亚麻布和羊毛织品制造业的发展时，它的行为亦很少是出于对希望有物美价廉的布料的穿衣者的同情，更很少是出于对工厂主和商人的同情。治安的改善，商业和制造业的拓展，都是一些崇高宏伟的目标。对它们的期待使我们感到高兴，凡是能对它们起促进作用的一切亦都让我们感兴趣。它们是**政府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借助它们的作用，政治机器的运转仿佛更和谐自如。看到如此美丽宏大的系统的完善，我们会引以为乐，而如果对它的和谐运转哪怕有丝毫的妨碍或干扰的任何障碍物未被排除，那么我们会心神不安。”<sup>①</sup>

正如我们已经简要说明的，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教规在历史上是盛衰消长的。然而，我们也相当经常地发现，在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同一个时期，这两种教规都得到了应用，但却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使用的。例如，在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明显地开始把李嘉图的贸易理论（这是一种以实物交换为基础的古典教规）用于出口政策，而把查尔斯·巴贝奇论机器和科学重要性的著作（这是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教规）用于国内目的。在当时，这种事实就被美国一位众议院议员明确地指出，他对此评论说，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就像许多其它的英国产品一样只是用于出口的目的。美国自己在 19 世纪也实用主义地把这种同一教规的二元主义用于日本。曾有一度，当美国忙于保护她自己的工业的同时，美国舰队司令佩里被派到日本，其目的是为了使日本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结果是签定了“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对他们自己历史的认识。

在 20 世纪，同样矛盾的政策得到了继续。由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出版的一本著作在描述美国的贸易政策时是这样开头的：“由于两党的一致性支持，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的美国总统就公开赞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他们发动了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国际计划。但几乎在同时，大多数总统提倡或者接受了对有问题的产业进行保护的特殊措施。这两种不同的政策思路产

---

<sup>①</sup>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Cadell and Davies, 1812, Vol. 1, p. 320（强调之处是本文引者自己所加）。中译文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四卷，余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5 月第一版，第 203-203 页。——译者注

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形象。”<sup>41</sup> 在这些场合，为了保护国家的制造业基础，从文艺复兴为基础的教规中——例如，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制造业重要”这个标题下——产生的论点就被工业界所呼唤。但也是在华盛顿，世界银行遵循着一种“制造业不重要”的战略，（在发展中国家<sup>①</sup>）推行结构调整计划，这种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脱工业化，带来了国家福利崩溃的后果。这是**有组织的自由贸易**的范式——一种矛盾修饰法（an oxymoron if there eves was one），它看来遵循着黄金规则（the Golden Rule）：“握有黄金的人制定规则”。

就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无知**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事实：他们自己的经济政策史令人惊奇地被遗忘了，这是一种**他们自己为了追赶当时的富国曾经使用过的**政策。在美国，这是非常清楚的。在今天的经济学史中，为美国 19 世纪的贸易政策和工业政策奠定基础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被提到，如果提到他们，那也是为了指出他们的“失败”。今天的美国经济学家们实际上众口一词地宣称：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新政”是由“坏的经济学家们”所执行的，这是多么的荒谬啊！

诸如史密斯（E. Peshine Smith）<sup>42</sup>——在把“美国制造体系”引入到日本这件事情上，他后来是一位关键性人物——马修·凯里，亚历山大·埃弗雷特（Alexander Everett），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和斯蒂芬·科尔韦尔（Stephen Colwell）这些经济学家们今天已经不被人所知，只有亨利·凯里被一些人所记得。

当然，这是与经济科学对在直觉上仍是令人惊异的“事实”的确认同时发生的：那些把欧洲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的经济学家们都属于可鄙的“重商主义者”。我们已经集体性地接受了亚当·斯密对在他之前的经济学家们歪曲性的处理：他们都把黄金误认为是实际的财富。德国经济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嘲笑那些对**重商主义进行歪曲的人们**（*die Karrikierer des Merkantilismus*），“只是过于频繁地重弹老调，仿佛那个时代的实业家和政治家几乎都相信贵金属能够用作人体的食物”<sup>43</sup>。文艺复兴理论重要的系统论方面——一国公共福利的创造——在今天的经济学中被清除出去了。

---

<sup>①</sup> “在发展中国家”是译者所加。——译者注

这种被琼·罗宾逊所谴责的玩弄“理论戏法”和“假定戏法”的战略目前在欧盟也存在。关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切尼报告把来自于单一市场的好处归之于**规模经济**。但另一方面，欧盟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却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并不存在。在 19 世纪，对于所有追随英国道路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工业中所存在的报酬递增是对工业进行保护的一个重要论点。今天，这个论点只是在欧盟内部所使用，在他们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制订中并不存在。用 19 世纪的（李斯特）对英国指责的话来说，现在的工业化国家“正在撤掉”工业化的后来者在发展上逐步攀高的“梯子”。只有在亚洲，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追赶，他们从日本那里拷贝了活动特定的文艺复兴战略。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常清楚地看到，亚当·斯密的理论与英国在她攀升为世界力量顶峰的过程中所执行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李斯特简洁地和准确地把英国的经济政策史总结如下：“在几个世纪内，英国以**出售制成品购进原材料**的准则来代替一种（经济）理论。”<sup>44</sup>

对李斯特来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藏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威廉·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理论可以如何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sup>①</sup>

自由贸易的实际历史记录证实了，英国没有拘束地执行着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试图阻止世界其他地方实现工业化的同样准则。传统的看法认为，19 世纪的法国是保护主义的一个大本营，而英国则是自由贸易的堡垒。但在对实际的贸易数据进行考察后，令人惊奇的结果则是，“在 19 世纪大部分的时间中，法国的平均关税一直低于英国的水平，甚至在谷物法被废除之后也是如此。”<sup>45</sup> 双重标准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

<sup>①</sup> List, Friedric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1), London, Longman, 1904, p. 368-369. 中译文引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61 第一版，第 307 页。——译者注

## 5. 文艺复兴经济学中的交流和基础设施

在文艺复兴经济学的传统中，首先，人类的思考和提出假说的能力是人类经济学（*human economics*）的基础。其次，这种能力取决于人类交流的能力。而这种交流又取决于天生的一致（*consensus gentium*）这种现象，在我们论莱布尼茨（Leibniz）和沃尔夫（Wolff）的论文中，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这种现象。<sup>①</sup>尤其是在他 1695 年对洛克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和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的抨击中，莱布尼茨论证道，只有人类的**理性精神**（**rational spirituality**）才能解释理想主义传统中的主体间的理解和交流的现象。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公共福利**这个的重要概念是一种协同效应的概念。舍拉（1613）特别地把一个城市的财富与这个城市中不同职业的数量联系起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取自威廉·配第——也清楚地意味着类似的规模报酬递增。这可能是为什么“劳动分工”从没有被纳入到任何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之中的原因——虽然“劳动分工”被欢呼为亚当·斯密最大的成就。在一些非常基本的意义上，分工与规模报酬不变是不相容的。分工是固定成本的结果——或者是在知识或者是在其他工具方面——它自动地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报酬递增。然而，当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谷物经济中排除报酬递减时，这就在今天的模型中消除了任何明确的市场解决办法：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不会相交，没有均衡可以被发现。在模型中，价格和数量将处于未定的状态。由于要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外生要素就会被放弃，这就废弃了标准经济理论关于均衡的核心假定，使得它在实践上没有任何用处。

因此，在文艺复兴关于经济学的概念中，存在着国家规模的报酬递增。重新创造并把这种城市的优势扩展到整个民族国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李斯特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都指出了，当英国在实现其国家统一的时候，荷兰的发展没有超出城市国家（城邦）集合体的范围。这是荷兰丧失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早期自治城市（城邦）的重商主义者观察到，在城镇聚集的密集人口的收益效应通过分工、个人和政治自由以及规模经济导致了生产的协同效应。因此，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拥有大量人口就被看作是巨大的利益。后来，国家重商主义者们试图通过国家

---

<sup>①</sup> Reinert and Daastøl, 1997, op.cit.见本书第三章第 6 节第 5 段。——译者注

发起各种交流和交通手段的建设，在国家规模上模仿同样的确有助益的机制。重商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人为地”在具有稀疏人口密度的地理区域上收获可观察到的城市高人口密度的好处。荷兰作家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在 1645 年写出了《莱顿城的福利》（*The Welfare of the City of Leiden*）。在 1662 年，他扩大了这本书的内容，取名为《荷兰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Holland*）。

在这种战略中，法律和秩序，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劳动法规，语言、度量衡、货币和教育的标准化，道路、运河、驿车、邮政路线和沿运输线“加油站”的建设等都是其组成部分。与主要是在沿海城邦兴盛起来的自治城市重商主义战略不同，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国家的福利**。那些沿海城邦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一种与内陆相对孤立的飞地型经济。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第一本著作<sup>46</sup>即《重商主义》恰当地被题名为“作为一种统一制度（Unifying System）的重商主义。”在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中，国家重商主义把君主政体与自治城市重商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了。这种反对封建贵族的国王与中等阶级的联盟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民族国家。

在稀疏的定居区，实行了一种走廊式发展的政策，这类似于行走在罗马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古丝绸之路的商队。通过人为地在沿运输线地区创造密集的人口，这些交通干线的建设在经济上更是值得的。此外，这种战略也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上巨大投资的目的是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城邦自身的投资目的。正如李斯特注意到的，基础设施导致了居民之间更多的交流。这使得对个人的政治控制更困难，因此创造了更大的政治自由。只有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公共舆论在达到关键的阈值后，才能获得发展成民主的足够强力。同时，通过交通的改善，与实物交换相反，市场的扩大允许了更大可能的规模经济，使得更高程度的多样化和为细分市场生产成为可能，发展了更高程度为货币市场的生产。规模经济诱导了技术的改进，使得更大比例的人口从事新的活动，再次通过正反馈环的形式对多样化、分工和规模经济做出贡献。重商主义者们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模仿把城市建模为一种巨大生产机器——工厂——的这些积极效应。

## 6. 教规战役：正面的对抗（从第一次到第五次的方法论之争）

有时候，这两种教规迎头相撞，我们把它命名为教规的方法论之争（*Canonical Methodenstreite*）。下面我们就描述这些方法论之战中的五次：

### 第一次方法论之争：米森登对马林斯 (1622 年至 1623 年)

至迟自 1622 年到 1623 年在杰勒德·德·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sup>47</sup> 与爱德华·米森登(Edward Misselden)<sup>48</sup>之间发生“英国的”争论以来，在当代主流教规与文艺复兴教规这两者的祖先之间的理论矛盾就已经存在了。在 1622 年到 1623 年的争论中，马林斯代表着一种植根于**实物交换**之中的静态理论，而米森登则代表着一种以**学习和生产**为中心的理论。米森登和马林斯都是来自于安特卫普并在伦敦工作的荷兰人。在经济思想史中，他们的争论被解释为是关于外汇管制和贸易平衡的。<sup>49</sup> 在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是一种“刻毒的甚至是辱骂性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吐沫星子满天飞”（*ink was shed like water*）<sup>50</sup>。

然而，追根溯源，人们可以发现，米森登对马林斯进行攻击的主要方向是马林斯对人的“机械”看法——马林斯忽略了人的“技艺”（*art*）和“精神（*soul*）”。米森登详细地引用了马林斯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林斯将贸易简化成了三个要素：“也就是商品、货币和汇率”<sup>51</sup>。米森登反对这种界定，他指出：“与否定**技艺原则**的人进行争论是反技艺的”。米森登指责马林斯没有看到在一堆石头和木材与一所房子之间的差别，因为正是人类的生产力和精神创造了房子，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人类的生产力和精神就被忽略掉了。类似的批评也同样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

米森登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敏锐意识，他意识到了人类的贫困和无知产生了众多的问题，也意识到了人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这种意识释放出了文艺复兴的热情和能量。这种情况使人想起了凯恩斯由于大萧条的次优状态所产生的挫败感。我们将试图说明，无论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对于凯恩斯而言，使社会摆脱次优状态的可行方案都是凯恩斯所说的“通过知识而得救”<sup>52</sup>。

在 18 世纪末，一种新型的经济理论出现了，这种理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界的“自然和谐”上。马林斯以及后来的曼德维尔（他也是一名荷兰人）都是这种观点的先驱，这种新型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达到顶峰，他在写作这本著作时，英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荷兰。曼德维尔的出名是因为他的著作《蜜蜂的寓言》（1714

年，但早期版本是 1705 年出版的)。有趣的是，马林斯在 1655 年出版了《蜜蜂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of Bees*)。在一种收割农作物的经济(harvesting economy)中使用蜜蜂作为人类经济的一种隐喻就遗漏了创造力、新奇和智力的作用。在今天，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新奇问题。

这种“收割农作物的经济”对法国重农学派也是极为重要的：“重农主义=自然的法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反重农主义者捍卫了文艺复兴的传统。在重农主义学说中，除了农业外，其他所有经济活动都被看作是没有生产力的(sterile)。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我们再次发现了一种关于人类的“动物主义(animalistic)”观点，正如我们在本章引言中已经引用的狗的隐喻。在今天的演化经济学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精神)分裂：演化学派倾向于用对生物学的羡慕取代“对物理学的羡慕”，但仍然遗漏了人类创造力的维度。今天，我们可以在保罗·克鲁格曼把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组织系统的观点中发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对等物：“全球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如此地确信是全球经济”。<sup>53</sup> 保罗·克鲁格曼的含义是清楚的：人类任凭无理性命运的摆布，这是我们所不能影响的，特别是在集体层次上是如此。

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清楚地说明了，在命运上浪费时间不是人类的职责：“对一切有理智的和有知觉的生物的普遍幸福的关怀，是神的职责，而不是人的职责。……造物主通过原始和直接的本能引导我们去发现达到这些(带来幸福的)目的的绝大部分手段，……(这些本能)促使我们为了自己去运用这些手段、丝毫不考虑这些手段是否会导致那些有益的目的，即伟大的造物主想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的目的。”<sup>①</sup> 这与克鲁格曼的隐喻是明显类似的。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著作《极端保守的花言巧语：任性、无益和危险》<sup>54</sup>追溯了这种理论学派的历史。

---

<sup>①</sup> *Adam Smith: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1759 (Liberty Classics 1976), part. VI, section II, Ch. III, p.237. 有趣的是，这种观点出现在一本据说是与《国富论》截然相反的著作中，该书首先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之上的，其次才是利己主义——原作者。注中文引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一版，第306页和第95页注解。此外，括号中的翻译是根据本文作者的引用译出的。——译者注



在我们看来，亚当·斯密和克鲁格曼都符合道德享乐主义的传统，这可以通过边沁（Jeremy Bentham）的下段引文被举例说明：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我们所能做的摆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它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功利原理——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把它当作……基础。凡试图怀疑这个原理的制度，都是……任性昧理，从暗弃明。”<sup>①</sup>

典型地，以实物交换为中心的关于财富的机械理论的支持者们在富裕国家出现了。在米森登/马林斯争论的时代，荷兰是领先国家，而英国和法国则试图对其追赶。在那个时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荷兰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其他早期的“英国”自由贸易者事实上是在城市工作的其他荷兰人，如范德林特（Vanderlint）。尼科拉斯·巴本（Nicolas Barbon）是另一位英国自由贸易者，就像约翰·洛克一样诞生在英国，但却在莱顿接受的教育。<sup>55</sup>

从对人类创造力的强调（米森登）到对“自然和谐”的强调（马林斯）这种转变是在库恩意义上的真正的范式转变。然而，必须承认，对于文艺复兴经济学来说，通过一种我们描述为**动态的和知识生产的寻租或熊彼特重商主义**的过程，知识的生产就得到了刺激，但现在这种生产知识的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已经退化为**静态寻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乐观主义理论关注“作为生产者的人类”的无限潜能，与此不同，新的经济理论则关注“作为交易者和消费者的人类”。这两种理论浸透着极为不同的实在观：旧的理论反映了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而新理论则以“**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的力学为基础，体现了一个实物交换的世界。旧理论是动态的和有机的，是以“思想”（Logos）和“werden”（生成）为核心的。而新理论则是机械的和静态的，是以“物质”和“sein”（存在）为核心的。在旧理论中，市场的角色只是知道自己行动方向的能动的人类的仆人，但在新理论中，作为自然秩序的体现，市场则获

---

<sup>①</sup>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0), London, University Paperback, Ch. I, p.11.中译文引自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一版，第57页。——译者注

得了许多“上帝”的特征<sup>56</sup>。维尔纳·桑巴特恰当地把文艺复兴经济学称为**积极-理想主义的**，而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则是**消极-物质主义的**。<sup>57</sup>

与文艺复兴经济学把进步看作是没有限制的——他们正确地看到了“人类知识无穷尽的边疆”——相反，在遵从马林斯的亚当·斯密的体系中，当“一个国家的土壤和气候的性质……允许该国所要求的最大财富”已经被达到之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一种“不能再向前发展”的静止状态<sup>58</sup>。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了，共享着同样假设——没有新知识进入到这一体系——的亚当·斯密和“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运动在实践上的结果。如果一种理论不考虑新知识的生产，那么，它在逻辑上的唯一结果就是：或者是一种静止状态（亚当·斯密）；或是一种“生态灾难”。通过简单的推断，这种灾难就可以被预测。但是，知识的每一层面都会带来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中，“知识”和“制度”的因素明显地是缺乏的并有意识地被排除了，这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不仅被忽视了，而且还积极地把它看作是不相干的。<sup>①</sup>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学对生产的关注相反，新古典经济学的焦点是实物交换与贸易。在1671年的论文中，莱布尼茨认为，实物交换起源于生产，并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贸易带来的仅仅是工厂所生产的（“*Nam Mercator transfert tantum, Manufactura gignit*”）。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从事生产的工匠的贫困是建立一个积极型国家（active State）的重要理由。“**终究，使工匠摆脱贫困不是社会的全部目的吗？**农民的问题并不危急，因为他们肯定有自己的面包，而商人的面包则太多了。”<sup>59</sup>

## **第二次方法论之争：反重农主义者对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 (ca. 1770 年至 1830 年)**

由于法国重农学派的兴起，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学派与（以新古典为基础的）当代标准经济理论的先驱之间的第二次方法论之战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了。可以说，重农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科尔伯特主义（**Colbertism**）不加区别地征税——

---

<sup>①</sup>参看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G. M. 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注

这已经脱离了科尔伯特主义的核心原则——这种盛行的政策的反动。但是，也可以说，它是地主们反对科尔伯特把资源有计划地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行动。

重农主义者继续着关于人类的动物主义观点：“……有时候他们把人看作是吃草的动物，（“这种人”）只关心他的食物，土地产品的最大化生产是他的社会理想。”<sup>60</sup>

反重农主义运动在经济思想史中几乎没有被注意到。然而，这些作者们代表着对文艺复兴经济学的真正延续。有趣的是，在法国，两位主要的重农主义的反对者是牧师：阿贝·马布利（Abbé Mably）和阿贝加利亚尼（Abbé Galiani），后者是那不勒斯被派到巴黎宫廷的外交使节。<sup>61</sup> 加利亚尼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历史学派在 19 世纪末方法论之战中的地位：“抽象的原理对于商业政策是没有好处的。在某种时间或某个地点是好的谷物法，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就是坏的……羡慕科尔伯特的政治家不应该模仿他，而是要问他自己，‘如果科尔伯特现在处于这种情况，他将做什么？’”<sup>62</sup> 这种对非常抽象和脱离情境的理论的批评非常类似于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对李嘉图 1820 年著作的反对。是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之父，他在 19 世纪下半叶是非常有影响的。

在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反对者之一<sup>63</sup>是福尔勃奈（Forbonnais），他拒绝承认贸易和工业不创造财富。对于福尔勃奈来说，创造财富的主要行为者是人类，而不是自然本身：没有人类的能动作用，土地本身注定是绝对或相对稳定的。在法国，同时代的其他的重农主义反对者是阿卡里亚斯·德塞龙尼（Accarias de Serrionne）、格拉斯兰（Graslin）、内克尔（Necker）、兰盖（Linguet。）

也许最强烈的反重农主义者是在德国。在“反重农主义（Antiphysiokraten）”的标题之下，洪佩特（Humpert）关于德国官房学派的传记列出了在 1771 年到 1832 年期间出版的 25 本著作。<sup>64</sup> 在这些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冯·普法伊费尔（Johann Friedrich von Pfeiffer）的 *Der Antiphysiokrat*。<sup>65</sup> 普法伊费尔也是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经济著作的作者。在欧洲大陆，其他的重农主义反对者是约翰·雅各布·冯·莫泽（Johann Jakob von Moser）、多姆（Dohm）和索南费尔斯（Sonnenfels）。

### 第三次方法论之争：美国体系对英国体系（19 世纪的美国）

美国对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反对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 1791 年的“论制造业报告”。虽然在理论层次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教育在 19 世纪末的常青藤联盟大学日益在增长，但在政策层次上的这种方法论之战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都在持续着。在某种意义上，康奈尔大学给这两种传统同时都提供了课程。在文艺复兴经济学的传统上，重要的经济学家有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马修·凯里和亨利·凯里（Matthew and Henry Carey）、约翰·雷（John Rae）、史密斯（E. Peshine Smith）和许多其他的人。在这种传统中最后的大经济学家是里查德·埃利（Richard Ely）和西蒙·帕滕（Simon Patten），他们像 19 世纪在海外学习的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在德国留学。

在政策层次上，19 世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采纳了由英国所提供的范例——后来当英国取得世界霸权地位后，她就放弃了这个范例。这些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国家在他们起飞前的时期都共享着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质的核心主题。<sup>66</sup>只有在国家工业活动的组合中把那些具有快速技术变迁和产出迅速增长的经济活动包括在其中，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初的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文献，再后来是德国的官房主义者。通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所钟爱的经济学家——英国重商主义者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sup>67</sup>，这个主题被引进到美国，由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非自愿的在美国的放逐，（通过他）这个主题再次在德国的关税同盟中得到强化。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偏爱德国模式的学派德意志学派（*doitsugaku school*）对日本社会的建设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 1945 年。<sup>68</sup>日本人接受了支配德国历史学派的独立自主的观点（*the autarkic views*）。在 1883 年之后的日本，“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德国教师们潮水般地持续流入”。<sup>69</sup>

几个世纪以来，成功的长期经济追赶的一个共同主线就是对自由贸易的共同的信任，除非国家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了被看作是**正确的**经济活动——即增加国家“生产力”的**特定活动**。通过在这些特定活动中的动态不完全竞争（也就是熊彼特的“历史报酬递增”），实际工资可以被提高：首先是在作为增长“发动机”的工业部门，随后就在整个国家的劳动市场中被扩散开来。在美国传统中，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在逻辑上是提高自身价格或价值（=工资）的必然方式。这种传统在美国一直存在到包括由里查德·埃利和西蒙·帕滕所教过的那代经济学家们为止。1996 年 8 月 16 日，在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witz）给本文作者之一的一封信中，他评论说，“我特别同意这种看法：‘余值’和增长一般地是产业特定的。这对于我是明确的，

因为在（20 世纪）30 年代当我是一位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读过库兹涅茨（Kuznets）和伯恩斯（Burns）的书……”。这确实指出了在老的美国学派与目前的“追赶经济学”之间的一种联系——虽然这不是一种非常强的必然联系。虽然没有参考其丰富的思想史，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提出的“高质量工作”仍是这种传统的继续。

我们认为，在 19 世纪的美国经济政策中，一般的看法是，某些经济活动要比其它的经济活动更好。工资水平的差别，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似乎都是不同程度不完全竞争的结果，它们都是由静态和动态因素共同产生的。长期以来，具有内在关联的商人和工业经济学就识别出了这些起作用的因素。

图 1-3 试图创造出一种由浅入深的区域，从而使任何时候的经济活动的“质量”可以粗略地通过由白——“完全竞争”到黑——“垄断”这种变化过程在图中绘制出来。整个体系处于持续的运动过程之中，一开始，新知识以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速度进入顶端，但当它们成熟时就逐渐地移向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状态。我们认为，在图 1-3 中所表达的意象（‘gestalt’）与 19 世纪美国的思想相一致，这种思想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要富裕，为什么自由贸易在对国家有利之前，国家不得不达到质量指数的顶端。在这种等级的底端，存在着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棒球生产者——海地，每小时挣 30 美分。这类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机械化。而在较高的等级上则坐落着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高尔夫球生产者，使用的是机械生产，每小时挣 9 美元。我们的看法是，在没有经过这类思考的时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曾经达到富裕的程度。定向于现实经济学的（The realökonomisch-oriented）重商主义明显地具有可与这种思考相比拟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在 1721 年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也许是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的著作<sup>70</sup>。

图 1-3 把在世界经济中阻碍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经济要素统一起来了。在一国之内即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同样的要素发挥着作用，但是，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是那么显著。在一国之内，有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较大程度工资均等的趋势：劳动力的流动，类似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来自工会的压力，等等。在所有的国家，传统服务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该国是否存在“高质量活动”所决定的。如果高质量活动不存在，这个部门的实际工作就低。在这种传统的服务部门中——例如，理发师、出租车司机和女服务员等，世界上的生产率水平是很类似。但是，他们（她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却差距很大。虽然玻利维亚或俄罗斯的理发师和出租车司机与第一世界的同行们同样是有效率的，但是，他们的实际工资只是其在瑞士或挪威的同行的一部分。

按照我们的看法，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具有同样效率的工人的补偿差距这么大。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机制，被大多数人所看作是全球“有效率的”市场并没有使世界福利最大化。通过把知识密集的高质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分散到所有的劳动力市场上，整个世界的平均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这种观点非常接近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观点，接近于从本杰明·富兰克林<sup>71</sup>开始的包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丹尼尔·雷蒙德等在内的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的早期美国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 图 1-3 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



#### 第四次方法论之争：历史学派对边际主义 (1883-1908)

19 世纪 40 年代，在 1848 年的政治事件之后，李嘉图经济学及其极端自由放任政策的巨大胜利招致了理论上的对抗运动。1873 年的国际萧条进一步在整个欧洲加强了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反对。德国是这种反对运动的大本营，在这个国家，由希尔德布兰得 (Bruno Hildebrand) ——他的著作是在 1848 年出版的<sup>72</sup>——卡尔·克尼斯 (Karl Knies) 和威廉·罗雪尔 (Wilhelm Roscher) 所建立的旧历史学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结论上都日益对李嘉图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后来，由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所领导的新一代历史经济学家们即年轻历史学派 (the younger historical school) 曾长期完全统治了德国学术上的和实践上的经济学。

奥地利边际主义学派的创建者卡尔·门格尔在 1883 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门格尔把他的第一本著作题献给了著名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门格尔在他 1883 年这本著作的前言的结尾处赞扬了近来的德国经济学，并希望他的著作“被看作是……来自奥地利一位同道者的友好致意。”但来自德国的反应是不友好的。施穆勒在他的《年鉴》 (*Jahrbuch*) 》上对门格尔这本著作进行了令人不快的评论，因此，门格尔在 1884 年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主义的错误》的小册子进行回击。<sup>73</sup>在所有的方法论之战中，这是最著名的一次，但充满悖论的是，它也是最少实质内容的。门格尔和施穆勒基本上对机械的和以实物交换为基础的英国理论都持有同样的批判态度。这是他们的个性和尊严之间的争斗，因为与李嘉图经济学相比，他们是最近的亲属 (next of kin)。这次方法论之战是在另一种教规内部所发生的具有内耗作用的内战。

施穆勒所期望的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反对把理论建立在内省的假设基础之上并从抽象的结构中推演出广泛的实践结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传统。熊彼特把这种经济学实践命名为“李嘉图恶习”。对于这次方法论之争，总的来说，今天标准的解释没有指出他们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批判是多么的类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把这次方法论之战描述如下，“(施穆勒) 因为三个理由拒绝门格尔的演绎方法：假定的非现实性，基本上与实际经济不相干的高度抽象，缺乏经验内容。因此，在研究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重要的主要问题时，理论是没有用处的；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怎样



发展成他们现在的状态，管束它们的规律和规则性是什么？（对于这类问题）作为一般的准则，适当的方法则是来自历史-经验研究的归纳法”。<sup>74</sup> 然而，从 2000 年的经济学已经变成怎样的视角出发，通读门格斯的《历史主义的错误》，施穆勒和门格斯的“另一种教规”事实上是怎样的就变得清楚了。我们将在第四章再回到这个论点。

历史学派深深地沉浸在抓住整体（*die Ganzheit*）的德国传统之中。这种对整体性的探究迫使历史学派跨越学科边界，进入到在英国传统中被看作是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按照德国历史传统，排除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任何信息都是绝对的愚蠢，这些信息无论是来自气候学、教育学或人类知识的任何其它分支。在德国历史传统中，经济学是一门把所有其它学科结合起来的科学。然而，门格尔是否不同意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清楚的。门格尔画了一张图，用来说明起作用的经济力量的模型，但是，就像后来的熊彼特一样，他坚持认为，历史对于经济学研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对门格尔来说，历史学派的问题是患有某种案例研究的“综合病症”：他们为了理论收集原材料，但是从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建立适当的理论。这是一种类似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对历史学派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对历史学派的某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更适合。确实，对“理论”的定义是关键性的。边际主义传统所寻求的是“纯理论”，这是一种从经济学中排除了在文艺复兴传统中作为历史驱动力的所有力量的形式化的理论。但是，在所有边际主义者中间，门格尔明显地最接近于历史学派，正如我们随后将讨论的，他既“发明了”边际主义，在同时他又远远地超越了它。

历史学派对边际主义的批判是：财富的起源即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从它的理论中消失了。这导致了一种 *Entgeistung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从科学中被排除了。德国伦理历史学派——里查德·埃利和西蒙·帕滕是其在美国的追随者——遵循文艺复兴的传统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规范科学，试图为了公共福利的利益而改变社会。对他们来说，道德是理性的，是经济学职业的整体（*the Ganzheit*）的组成部分。与之相反，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来说，道德是非理性的，是以休谟和斯密传统中的同情（感情）为基础的。相应地，对英国学派来说，道德是完全与经济学相分离的。

## 第五次方法论之争：美国制度学派对新古典学派（20 世纪）

制度经济学是 19 世纪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学传统的延续。制度主义——这个术语最初被发明只是为了指代美籍挪威后裔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的著作——继承了“美国体系”反对英国抽象理论结构的激进取向。

制度主义者们对现成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打算彻底推翻它。因为制度主义的理论是实践性的（*praxisnah*），也就是经验性的和接近现实的，所以，他们吸引了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在学术上和影响力方面，美国制度主义在动荡的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顶峰，可以认为，在没有凯恩斯精练的理论框架条件下，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制度政策制定者们预见到了凯恩斯的政策药方。

虽然制度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就衰落了——真正的衰落是在麦卡锡主义的年代，但它对华盛顿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仍逗留不去。最近，两本资料丰富的书追溯了制度经济学在美国的让位：约内（Yuval Yonay）的《为经济学的精神而奋斗》<sup>75</sup>，以及一本名为《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到战后新古典主义》的论文集。<sup>76</sup>

现在，保罗·克鲁格曼抱怨说，“不只是经济学家们丧失了对论说的控制；而且由标准教科书所提供的那类思想完全没有进入那种论说……”<sup>77</sup>。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经济学家们把控制权让给**那些人**，克鲁格曼列示了由“政策制定者、企业领导人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sup>78</sup>所组成的一种联盟。这些人是今天捍卫常识和制度主义的实用主义的集团，他们反对标准教科书经济学纯粹的规则。在熊彼特所指责的**李嘉图恶习**之上，我们可以添加**克鲁格曼恶习**：在拥有与现实更相关的经济理论的情况下，例如新贸易理论，但却拒绝在真实的世界经济政策中应用这些原理。

因此，虽然新古典主义在学术界、在我们对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策制定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制度学派折中的实用主义仍存在于美国和西欧的政策制定中。在学术界，这个学派的支持者今天大部分散见于商学院、政府研究系和国际事务研究机构。由于另一种教规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系实际上的被消灭，对世界穷国事务的处理仍然由华盛顿机构所管理的纯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控制。

## 7. 国际贸易政策与两种教规

当新古典经济学达到顶峰的时候，从基于实物交换的教规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保罗·萨缪尔森在 1949 年/1950 年做出的证明：在新古典经济学通常的假设下，国际贸

易将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转向自由贸易，那么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在全世界将会是同一的。在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进行回应时，出现了甚至更强有力的新古典乌托邦：在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之下，世界上所有的工资收入者都将同样地富裕。这种理论至今仍是世界经济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我们看来，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工资收入者在自由贸易之下都将同样地富裕，这种反直觉的结论显示出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学究式的和循环推理的（*circuitous*）经院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当学术交流的语言是数学的时候，这种危险就是内在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所有数学都是自参考的（*self-referential*）”。在它的极端形式上，经院哲学也“证明了”与常识和直觉相矛盾的事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已经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教规是“经院哲学”。按照同样的精神，丹麦经济学家伯克（L. V. Birck）把他对庞巴维克（Böhm-Bawerk）的理论进行讨论的文章取名为‘*Moderne Skolastik*’<sup>79</sup>。

19 世纪初，对李嘉图贸易理论即时的常识性答复——例如，在美国非常有影响的丹尼尔·雷蒙德的论文中——是知识的作用在直觉上的吸引力。前李嘉图常识性的推理是沿着这种推理思路进行的：如果律师的收入是洗盘子收入的十倍，那么，一个律师之国为什么会与一个由洗盘子的人所组成的国度同样富裕呢？从 1621 年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的著作开始，对于文艺复兴的教规来说，这是清楚的：在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对称性（*symmetrical*）”国际贸易对参与各国都是有益的，而“非对称性贸易”基本上只对两个贸易伙伴中更发达的一方有利。按照 19 世纪美国和德国经济学的精神，在我们看来，对称性贸易就意味着，它是发生在图 1-3 中处于粗略同等质量层次上的商品之间的贸易，而非对称性贸易则是发生在图 1-3 中处于非常不同水平位置的商品之间的贸易。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外是，一个非常大和动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吸收了一个比较小和比较贫困的国家，并提高其生活标准，最近加入欧盟的葡萄牙可能是这样的例子。

萨缪尔森以及李嘉图都没有说明在文艺复兴教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要素：1) 在这种教规中的知识以及知识本身，2) 各种经济活动在**吸收**知识上的不同能力。这种观点——经济活动吸收知识的能力——是美国早期保护主义者丹尼尔·雷蒙德的关键性论点<sup>80</sup>：因为不同的职业在**有利可图地吸收资本**（人力的或其他的）上具有不同的能力，所以不同的职业在创造福利上具有不同的“机会窗口”。人们不可能在洗盘

子的工作上有利可图地增加的人力资本会像成为一个律师那样多。正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们会向他们的孩子们推荐需要大学教育的职业，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在国家层次上就被描述成了“重商主义地对某种职业而非别的职业的偏爱”。但是，亚当·斯密在这点上却是始终如一的：考虑到所有风险，让你的儿子成为一名修鞋匠的学徒要比成为一名律师更安全（亚当·斯密没有儿子）。

就国际贸易在公共福利的创造中的作用而言，文艺复兴观点的一种简洁版本可以在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论著中被发现：“如果劳动力价值的进口大于出口，那么国家就有损失。”<sup>81</sup> 更先进的文艺复兴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方面，我们称之为“劳动小时的贸易条件（The labour-hour-terms-of trade）”<sup>82</sup>。如果人们对普通老百姓的福利感兴趣，那么这就是可以观察的重要变量。今天，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棒球生产者（手工缝制）是在海地，每小时挣 30 美分，而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高尔夫球生产者（机械生产）是在发达国家，每小时至少挣 9 美元。按照重商主义/文艺复兴经济学的观点，通过出口棒球并进口高尔夫球，海地是在用 30 个小时的（棒球）劳动交换（高尔夫球生产的）1 小时劳动。海地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在这里，需要牢记在心的关键性事情是，在这个例子中，棒球生产者和高尔夫球生产者都是在用**前沿技术**（*state-of-the art technology*）进行生产：当高尔夫球的生产是机械化的同时，美国所有的资本仍没法使棒球的的生产实现机械化。技术变迁的这种不平等进步有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锁定在贫困和无知的比较优势状态。今天的经济理论忽视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它被更有经验的文艺复兴的重商主义者清楚地感觉到了，因为他们优先地考虑到了“技能”和“知识”这些变量。

自从米森登与马林斯之间发生方法论之战的时代以来，自由贸易就一直是领先的技术和经济权力逻辑上的战略。为了追赶对知识进行保护并生产知识是对领先者进行追赶然后超过他们的国家形态（the pattern of nations）。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实际上所有这些情况中，为了追赶对知识积累进行保护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因为世界贸易是由知识密集的和较少知识密集的产品所构成，所以，对于那些在贫困和无知上专业化的“文盲的”国家来说，存在着明显的风险。今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已经完全丢失掉了这个维度。

在我们看来，在保护领先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压制的既得利益上，标准经济理论的核心假定明显地发挥着一种政治的作用。对于一个拥有独特技术知识的国家来说，“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的假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也对

从事制成品大量生产的国家是有益的，但对专门从事服从于报酬递减规律的农业和采掘活动的国家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在我们看来，讨论经济理论中所存在的“以假设为基础的租金”是正当的。对于那些用出口高尔夫球的 1 小时劳动交换进口棒球的 30 小时劳动的国家来说，这种自然增长的租金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假设为基础的”租金。人们确实可以把今天的世界划分为两组国家集团：一组是已经通过了文艺复兴经济学阶段的国家即工业化国家；另一组则是其他的或贫穷的“南方”国家，他们继续为工业化的北方国家生产以假设为基础的租金。

## 8. 现代经济学中的两种教规：理论和实践政策

在对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初步评论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做出了如下评论：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人类在某一时代的普遍信念——这是一种在当时没有人能够逃脱的信念，如果没有任何天才的或富于勇气的非凡努力，也是不能逃脱的——在后一时代看来是如此明显地荒谬，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可以想象这样荒谬的信念曾经显得那样可信……这就像儿童不成熟的幻想即刻就被任何成人的训诫所制止了一样。”<sup>83</sup>

今天，标准经济理论最强有力的结论就是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只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工资收入者都将会变得同样的富裕。在我们看来，这种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定律”——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就建立在其上——明显地就是一种在后一时代将变成明显荒谬的信念。正如给重病人放血这种通常的实践一样——这种实践曾经在长达几个世纪中是医学职业的一种普遍信念——今天在实践中应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及其政治推论也是一种在实质上伤害了最虚弱病人的做法；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被伤害的是最贫困的国家。

无疑，自由贸易是富裕国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来自于对称自由贸易的巨大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静态收益，而是得自于协同效应、动态和以规模为基础的贸易收益，这是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中的现实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从 1613 年的安东尼奥·舍拉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长期以来就已经指出的，这也是诸如保罗·大卫、布赖恩·阿瑟和有时候的保罗·克鲁格曼等现代经济学家们正在重新发现的思想。

偶尔，来自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其他直觉上的回闪出现在今天的形式化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 Lucas）1988年的文章：《论经济发展的机制》<sup>84</sup>，就像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它认为，学习的潜力在各种经济活动中是不同的。在卢卡斯的模型中，获得最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也将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这种观点在这里可以富于成效地被应用。因为这个原因，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国际流动的日益增加将扩大而不是减少国际不平等和国际移民的压力。我们认为，卢卡斯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篇论文中重新创造出了为什么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古典重商主义的论点：因为经济活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在知识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进行没有限制的自由贸易将导致那些低于某种知识门槛的国家产生明显的福利损失。

卢卡斯在他的论文中说，“像这类问题所涉及到的人类福利的后果是惊人的简单：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它们，就难以再思考别的问题了。”<sup>85</sup>今天，标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这种职业中的任何一位研究生都能生产对他可能有的最得意的思想进行“证明的”模型。只要这种职业继续混淆“理论”与“科学”——只要生产出来的模型在真实的世界中只具有非常有限的证明，如果具有的话——那么，经济科学所生产出来的模型就能“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东西。这就给了今天的政治家们在可供选择的并常常是矛盾的理论中按照国家的偏好和既得利益进行挑选的一种实际上的‘smörgåsbord’。卢卡斯1988年的模型与世界贫困问题是真正相关的，但却消失在其他更精致而不相干的茫茫一片的模型之中了。

按照我们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三个因素导致了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的几近绝迹。

1) 冷战对那些能够防御极权主义对西方威胁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创造了大量的需求。新古典理论的完善市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防卫线。共产主义允诺各取所需。新古典经济学用一种甚至更强有力的观点进行回击：在他们的体系下，世界上所有的工资收入者就会得到同样的富裕，也就是都能到达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希望之地。虽然这种理论的基础是更早的，但在我们看来，新古典形式化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不只是一种巧合。萨缪尔森在柏林封锁<sup>①</sup>期间“证明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米尔顿·弗里

---

<sup>①</sup>指1948-1949年苏联对位于德国苏占区包围之中的由英美法占领的西柏林地区实施的地面交通封锁，这是冷战初期的一次严重危机。——译者注

德曼在麦卡锡主义<sup>①</sup>的高潮时期对违背现实的假设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进行了辩护。冷战需要李嘉图和斯密，他们确实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2) 从事后看，自启蒙运动开始的世界图式的机械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同一时期可能达到了顶峰。选择数学作为经济学的**混合语** (the *lingua franca*) 以及这种职业被数学化的方式也明显地对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死亡做出了贡献。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关键性变量不能简单地化简为数学。文艺复兴经济学依赖于不同形式的理解 (understanding)，这是德国哲学家们称之为**理解** (*verstehen*) 的定性的理解 (the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与之相对立的是作为硬科学之特征的**定量测量** (the quantitative *begreifen*)。试图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熊彼特给自己规定的但却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作为经济变化之基础的创造过程是不可能化约为以 19 世纪物理学为基础的数学。然而，现代复杂性理论似乎有可能完成熊彼特所追求的东西。

3) 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的研究和生产产生了一种令人生畏的知识基础，这种基础导致了战后的创新和生产繁荣。一旦福特制技术范式处于运转之中，就不再需要把人类的创造力解释为增长的主要发动机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从战时经济中解放出来后，就象从前一样，依靠的是人类创造力的存量。由于从凯恩斯那里已经学到了怎样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所以经济学专业是自信的。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在不受真实世界打扰的情况下沿着数学化阻碍程度最小的道路前进。不幸的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创造福利的哲学家的真谛 (the philosopher's stone)，认为可以消除经济周期的看法是错误的。当凯恩斯主义对金融和货币方面的强调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提供了正当的解释的同时，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助长了金融资本主义占了生产资本主义的上风。

在我们看来，这三个因素——冷战对特定理论类型的需求、选择以物理学为基础的静态模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创新活动的繁荣——相互强化，以一种最不幸的螺旋方式消灭了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经济学被提升到了就相干性来说是不科学的抽象水平上。

今天的演化经济学日益成长为对标准的、以新古典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一种替代。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实施了 the TEP-项目 (技

---

<sup>①</sup>指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冷战氛围，打着“反共”旗号，在全美煽动的一场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运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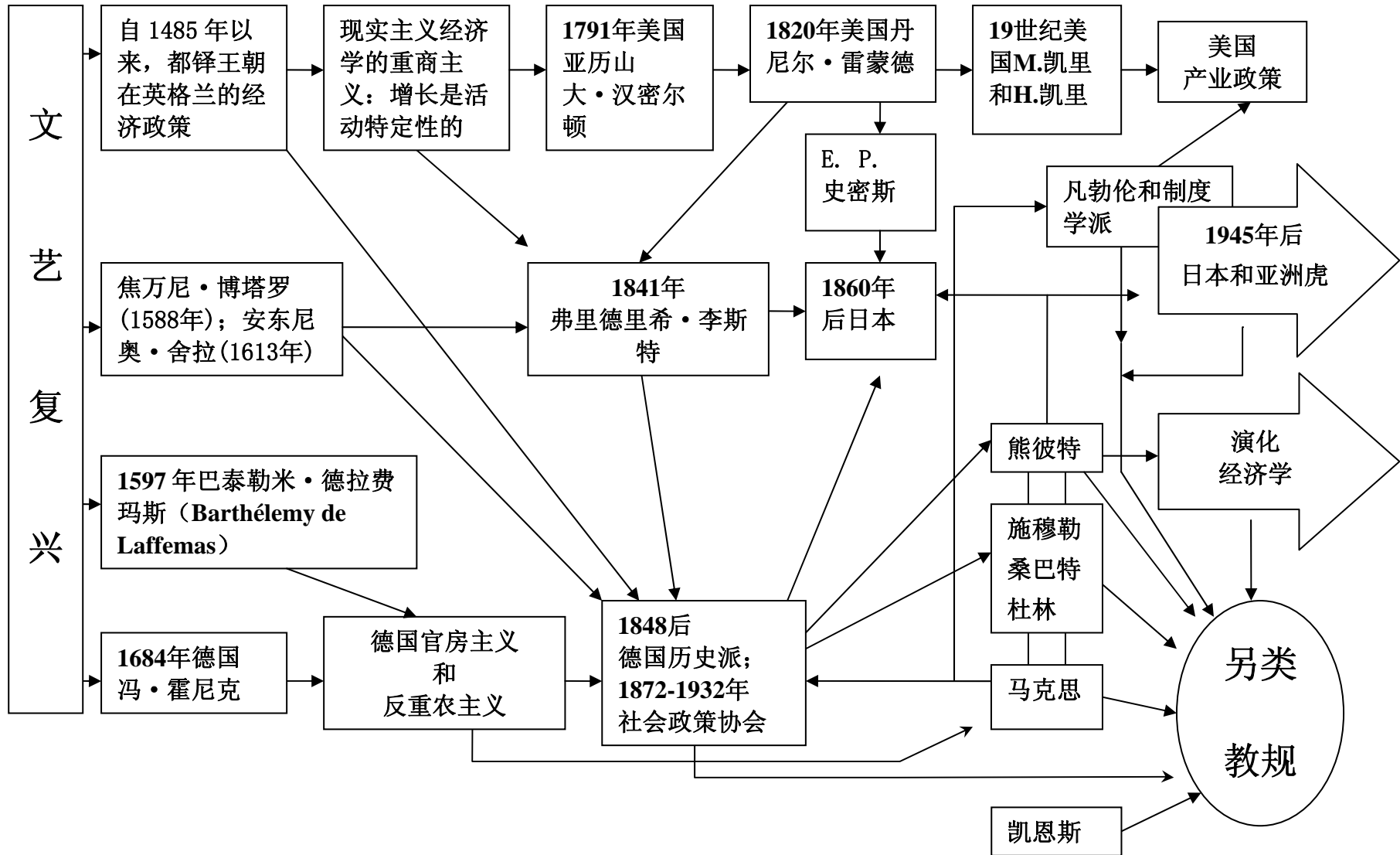
术与经济)，演化经济学在工业化国家作为一种政策指导赢得了声望。在最好的状态下，这种演化理论抓住了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实质。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只是用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机械式的经济学理解——“生物学羡慕”替代了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式的经济学理解——“物理学羡慕”。演化经济学不只是需要从物理学转向生物学，而且它还需要沿着从物质到精神的轴线进行移动。

虽然把演化与制度理论应用到第三世界的潜在收益要比应用到第一世界更大，但这种理论对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仍没有任何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世界银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考虑他们的国籍——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的经济学系受的教育，在这些地方，演化理论没有被思考。正如文艺复兴的知识是在旧有的大学结构之外——在科学院被创造出来的一样，在大多数国家，熊彼特演化经济学在今天主要是在大学的经济学系之外被实践着。

正像经济学在经济学系的实践一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对经济学的需求实质上更长久。这些理论太一般和太抽象，被感觉到与真实世界中任何实践的目的地是不相干的。目前，标准的教科书理论在其纯粹的形式上——在政策实践上——基本上只被应用到第三世界。这些教科书理论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应用到第三世界的，他们实际上对于富裕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验。在我们看来，有选择地使用经济理论根本上就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情况，它对穷国的福利有着巨大的影响。今天，世界共同体确实正分别在富国和穷国应用着不同的医学。复兴非均衡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需要是迫切的，在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复兴这种另类教规的需要同样也是迫切的。



# 现实经济学：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另类教规经济学



---

<sup>1</sup> 肯尼思·阿罗使用这个隐喻描述了报酬递增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自安东尼奥·舍拉在其1613年的著作（Antonio Serra, 1613）中描述了这种现象后，报酬递增就在文艺复兴经济分析的教规中或明或暗地处于核心地位了。舍拉明确地把报酬递增与制造业联系起来。肯尼思·阿罗的这句话源自于他为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的著作所撰写的前言（Arthur, W. Bri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y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sup>2</sup> Sombart, Werner,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ünchen &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30.

<sup>3</sup> Nelson, Richard and Sidney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sup>4</sup> Freeman, Christopher, *The Economics of Hope*, London, Pinter, 1992.

<sup>5</sup> Schumpeter, Joseph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68.

<sup>6</sup> 熊彼特对重农学派评论说，“它的分析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成功是巨大的”，见Schumpeter, *op.cit.*, p. 175.

<sup>7</sup> 在德国，主要的反重农主义者是约翰·弗里德里希·冯·普法伊费尔（Johann Friedrich von Pfeiffer），在法国是阿贝·马布利（Abbé Mably）、阿卡里亚斯·德塞龙尼（Accarias de Serrionne）、内克尔（Necker）、福尔勃奈（Forbonnais）、让·格拉斯兰（Jean Graslin）、阿贝·加利亚尼（Abbé Galiani）一位驻巴黎宫廷的那不勒斯外交使节——还有他们中最具关键性的人物：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y Linguet.）。有关德国反重农主义者的著作目录请参看Humpert, Magdalene, *Bibliographie der Kameralwissenschaften*, Cologne, Kurt Schroeder, 1937, p. 1031-1032.

<sup>8</sup> (Giovanni Botero, 1589) 在其著作中对这些协同效应进行了清楚的描述，安东尼奥·舍拉在其著作（Antonio Serra, 1613）中的描述甚至更清楚。对舍拉来说，这些“良性循环”来自于可以在制造业部门所发现的报酬递增，而在农业部门则缺乏报酬递增。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也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公共利益是使城市伟大的力量”。‘Il bene comune è quello che fa grandi le città.’

<sup>9</sup> Eli Hecksher quoted in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 278.

<sup>10</sup> Abraham Lincoln, Speech of the 18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 
- <sup>11</sup> 即查理曼帝国和继其出现的法、德国家（I.e.: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and the succeeding French and German States.）
- <sup>12</sup> 在小的地区如香港或小的国家如圣马力诺（San Marino），存在着可能的例外。
- <sup>13</sup> The US edition i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New York, Norton, 1930.
- <sup>14</sup> Reinert, Erik and Arno Daastøl,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 (1997), pp. 233-283.
- <sup>15</sup> Crowther, J.G., *Francis Bacon. The First Statesman of Science*,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60, p. 97.
- <sup>16</sup> List, Friedrich,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1), London, Longman, 1904, pp. 66-67.
- <sup>17</sup> *ibid.*, p. 142.
- <sup>18</sup> Rome, Vicenzio Pellagalo, 1590.
- <sup>19</sup> Arthur, W. Bri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y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 <sup>20</sup> Buchanan, James and Yong J. Yoon (editors), *The return to Increasing Retur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 <sup>21</sup> List, Friedrich, *The Natur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7), edited by W. H. Henderson, Totowa, N.J., Frank Cass, 1983.
- <sup>22</sup> '...seine Begriffe 'schweben' umher wie die unerlösten Seelen an den Ufern des Hades',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Vol. 2, *Das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München u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8, p. 929.
- <sup>23</sup>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strategy, see Reinert, Erik, 'Catching-Up From Way Behind. 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on First World History', in: Fagerberg, Jan et. al.,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4.
- <sup>24</sup> Clément, Pierre (Editor), *Lettres, Instructione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Imprimerie Nationale, 1861-1872, 7 Vols. in 10 + 1 Volume 'Errata Général et Table Analytique.'
- <sup>25</sup>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concept, see Bijker, Wiebe,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edito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sup>26</sup> Whatley, G. *Principles of Trade. Freedom and Protection are its best support: (sic) Industry, the only Means to render Manufactures cheap*, London, Brotherton and Sewell, 1774.

<sup>27</sup> See Morris, R.B.,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57, p. 285.

<sup>28</sup> ‘Ich sage das auf die Gefahr hin, als Neo-Merkantilist abgestempelt und in das Raritätenkabinett unseres Faches übergeführt zu werden.’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Vol. 2: *Das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p. 925.

<sup>29</sup> Hudson, Michael, *E. Peshine Smith: A study in Protectionist Growth Theory and American Sectionalism*, Ph.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1969, p. 45.

<sup>30</sup> Sugiyama, C. and H. Mizuta,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Comes to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8, p. 32.

<sup>31</sup> Berlin, Gebr. Mann, 1900. 在该文中，作者的全称是 *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美国重要的保护主义者史密斯（E. Peshine Smith）一样，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 1811-1872)是美国政治家威廉·西沃德的门徒，后者是美国国务卿和共和党的创始人。该党在美国这个时代是“文艺复兴经济学”的主要支持者。格里利创立了《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并在该报当了 31 年编辑。卡尔·马克思是该报的欧洲新闻通讯员之一，他发给《纽约论坛报》的通讯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品。

<sup>32</sup> ‘Man kann aus den Menschen machen, wass man will; die Art, mit der er regiert wird, entschliesst ihn zum Guten, oder zum Bösen.’ Pfeiffer, J. F. von, *Lehrbegrif sämtlicher oeconomischer und Cameralwissenschaften*, Mannheim, Schwan, 1777. Volume 3, Tome 1, (Des dritten Bandes erster Theil), p. 2.

<sup>33</sup> Marshall, Alfr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p. iv.

<sup>34</sup>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les, Lazzaro Scoriggio, 1613.

<sup>35</sup> Marshall, *op.cit.*, pp. 315-316.

---

<sup>36</sup> This problem is discussed in Hart, Nei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theory: Marshall’s reconciliation problem’ ,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E9004, 1990.

<sup>37</sup> Mirowski, Philip,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four metanarratives on what metaphors are for’, in Mirowski (Ed.), *Natural Images i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sup>38</sup>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17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Vol. 2, p. 219. (Book V, Ch. I, Pt. I)

<sup>39</sup>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17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Vol. 1, p. 487. (Book IV, Chapter II).

<sup>40</sup> This is Gunnar Myrdal’s term.

<sup>41</sup> Hufbauer, Gary C., Diane T. Berliner and Kimberly A. Elliot,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1 Case Stud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6, p. 1.

<sup>42</sup> On E. Peshine Smith see Michael Hudson’s 1969 Ph.D. thesis: *E. Peshine Smith: A Study in Protectionist Growth Theory and American Section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In the 1970’s Hudson edited a series of reprints of 19th Century US economists.

<sup>43</sup> Dühring, Eugen,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1879, quoted in Sombart, *op. cit.*, p. 913.

<sup>44</sup> List, Friedrich,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44), Basel, Kyklos, 1959, p. 12. 我们自己的翻译。这是李斯特著者自序中的一部分内容, 在英文版中, 李斯特的著者自序被大量地删节了。

<sup>45</sup> Nye, John Vincent, ‘The Myth of Free-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 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March 1991, p. 23.

<sup>46</sup> Heckscher, Eli, *Mercantilism*, London, Allan and Unwin, 1935, 1st Swedish edition; *Merkantilismen. Ett led i den ekonomiska politikens historia*, Stockholm, Norstedt, 1931.

<sup>47</sup> Malynes, Gerhard, *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According to the three essentiall (sic) Parts...Commodities, Moneys and Exchange of Moneys*, London William Sheffard, 1622, and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r, A Refutation of a Treatise,.....,lately published by E.M.*, London, Nicholas Bourne, 1623.

---

<sup>48</sup> Misselden, Edward, *Free Trade and the Meanes (sic) to Make Trade Flourish*, London, Simon Waterson, 1622, and,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r the Ballance (sic) of Trade*, London, Nicholas Bourne, 1623,

<sup>49</sup>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讨论了在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44-345. 也可参看‘The New Palgrave’有关他们的词条。所有这些论述都把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看成是有关纯粹的货币和汇率问题了。

<sup>50</sup> Buck, Philip,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New York, Henry Holt, 1942, p. 23.

<sup>51</sup> Misselden, *op. cit.*, (1623), p. 8.

<sup>52</sup> *Ibid.*, p. 102.

<sup>53</sup> Krugman, Paul, *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 Cambridge, Mass. &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99.

<sup>54</sup> Hirschman, Albert O.,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55</sup> On this issue, see Raffel, Friedrich, *Englische Freihändler vor Adam Smith*, Tübingen, Laupp, 1905.

<sup>56</sup> On this point see Viner, Jacob,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2.

<sup>57</sup>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Vol. 2, *Das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leben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München u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28, p. 919.

<sup>58</sup>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17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106.

<sup>59</sup>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Society and Economy’ (1617), reprinted in *Fidelio*, Vol. 1, No. 3, Fall 1992, p. 54.

<sup>60</sup> Higgs, Henry, *The Physiocrats*, London, Macmillan, 1897.

<sup>61</sup> 就加利亚尼和他在当时法国社会的独特地位来说，一个很好的描述可以在以下著作中被发现：Pecchio, Giuseppe, *Storia della Economia Pubblica in Italia*, Lugano, Tipografia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1849, pp. 80-86.

---

<sup>62</sup> Higgs, *op. cit.*, p. 117.

<sup>63</sup> 反重农主义问题在以下著作中被讨论了： Weulersse, Georges,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Paris, Alcan, 1910, vol.. 2, pp. 256-682, and in Higgs, *op.cit.*, pp. 102-122.

<sup>64</sup> Humpert, Magdalene, *Bibliographie der Kameralwissenschaften*, Cologne, Kurt Schroeder, 1937, pp. 1031-1032.

<sup>65</sup> Pfeiffer, Johann Friedrich von, *Der Antiphysiokrat, oder umständliche Untersuchung des sogenannten physiokratischen Systems für eine allgemeine Freyheit und einzige Auflage auf den reinen Ertrag der Grundstücke*, Frankfurt am Main, Schäfer, 1780.

<sup>66</sup> This is described in Reinert, Erik, *Thoughts before Takeoff. Hva mente økonomene i de nåværende i-land om næringspolitikk og økonomisk vekst før disse landene ble rike?*, Parts 1 and 2, Oslo, STEP-Group, mimeo, 1992.

<sup>67</sup> It has been shown that Hamilton knew his Adam Smith, but rejected particularly the free trade conclusion. Excerpts from Postlethwayt's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were scattered through Hamilton's Army pay book, see Morris, Richard B.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57, p. 285. Hamilton's view on the English classical economists was similar to that taken 80 years later by the Japanese, see Morris-Suzuki, Tessa,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89.

<sup>68</sup> Yagi, Kiichiro, 'German Model in the Modernisation of Japan', in *The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1-2, April-October 1989, p. 29.

<sup>69</sup> Sugiyama, Chuhei, and Hiroshi Mizuta,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comes to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8, p. 32.

<sup>70</sup> King, Charles, *The British Merchant: or Commerce preserv'd*, London, John Darby, 1721, 3 Vols.

<sup>71</sup> 特别参看See particularly Franklin's comments printed as footnotes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Whatley, G. *Principles of Trade. Freedom and Protection are its best suport: (sic) Industry, the only Means to render Manufactures cheap*, London, Brotherton and Sewell, 1774.

<sup>72</sup> Hildebrand, Bruno,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Frankfurt, Literarische Anstalt, 1848.

- 
- <sup>73</sup> Menger, Carl, *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Wien, Alfred Hölder, 1884. See also Ritzel, Gerhard, *Schmoller versus Menger*, Frankfurt am Main, n.p., 1950.
- <sup>74</sup> Fusfeld, Daniel R, 'Methodenstreit',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Macmillan, London 1987, p. 454.
- <sup>75</sup> Yonay, Yuval,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up>76</sup> Morgan, Mary S. and Malcolm Rutherford (editors), *From Interwar Pluralism to Postwar Neoclassicism*, Annual Supplement to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up>77</sup> Krugman quoted in Reder, Melvin W., *Economics. The Culture of a Controvers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6.
- <sup>78</sup> *Ibid.*, same page
- <sup>79</sup> Birck, L.V., 'Moderne Scholastik. Eine kritische Darstellung der Böhm-Bawerkschen Theorie',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24, No. 2, pp. 198-227. Birch heads the article with a motto from Carlyle: 'That dismal science !'
- <sup>80</sup> Raymond, Danie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1820.
- <sup>81</sup> Steuart, Sir Willia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illar & Cadell, 1767, Vol. I, p. 336.
- <sup>82</sup>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看Reinert, Erik 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Mechanisms of Underdevelop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1980.
- <sup>83</sup> 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New York, Kelley, 1987, p. 3.
- <sup>84</sup> Robert 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 <sup>85</sup> *Ibid.*, p. 8.